

寶生如來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降三世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臺大學



安國寺《仁王經》立體曼荼羅復原圖　作者等繪製

DOI: 10.6541/TJAH.202309_(55).0002

唐長安大安國寺白石造像與《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賴依縵*

【摘要】二十世紀中葉，西安發現窖藏11件貼金彩繪石刻造像，為中原地區罕見的唐代密教文物，推測其出土地點應為長安城具官寺性質之大安國寺遺址；本論聚焦於其中年代最早的佛、菩薩、明王、天部之6尊精美白石雕像。除了風格分析並配合佛教經典及相關歷史脈絡，考訂其製作年代應為代宗朝大曆元年（766）左右，依不空新纂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及其註釋所造立體曼荼羅。代宗朝不空順應唐代社會情勢，強調密教「護國」功能，成功獲得帝王及掌握軍政權力者支持，將密教傳播推上高峰。此組造像不僅提供其傳法事業的罕見例證，亦有助於重建日本密教僧踏上唐土前近半世紀的唐代密教及其圖像的歷史。

當今最著名的《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相關作品，為京都東寺講堂九世紀的木雕立體曼荼羅，擘劃者真言宗祖師空海曾入唐長安求法，師從不空弟子惠果，返國後亦繼承不空教團論述，陸續以「護國」為名建立道場。不空順應在地民情，將密教演繹為成就出世間佛法與世間護國大法的不二至道，建立起與唐王朝共榮的紐帶關係，為日本僧人承繼，促使密教在東亞生根茁壯。此6件白石造像，應是東亞獨特的「護國」密教首次實踐的跡證。

關鍵詞：唐代、佛教雕刻、密教、不空金剛、護國

1959年西安市城牆東北方500公尺電廠路，出土窖藏11件貼金彩繪石刻造像，被認為是唐代長安派大理石像最後的代表作，考古學家推測出土地點為長安城內長樂坊大安國寺。大部分造像皆嚴重損毀，應是會昌年間（840－846）武宗滅佛時遭刻意破壞。① 此批造像亦是中原地區出土為數甚少的唐代

＊國立故宮博物院 副研究員

① 程學華，〈唐貼金畫彩石刻造像〉，《文物》，1961年7期，頁61-63。報告中把菩薩型頭像及菩薩或天部殘像（圖2、4）認定為1組，因此文中敘述發現「10」尊造像，但實應出土11件文物。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本文編，頁19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密教造像，對於理解東亞密教藝術及其歷史，意義重大。②

大安國寺造像可大分為白石8尊（圖1-8）、青石3尊（圖9-11）兩大類；白石造像中有2尊為三面八臂明王（圖7、8），其他6尊，除了1件原屬於菩薩或天部之菩薩型頭像（圖2）狀況不明，其餘5尊皆為二臂像，包括如來像（圖1）、菩薩像（圖3）、菩薩或天部之菩薩型殘像（圖4）各1尊，及明王像2尊（圖5-1、6）。如來與菩薩型造像均附有華麗須彌座三重蓮臺，明王則有岩座。從造像風格考慮，此5尊白石二臂像及頭像時代最早，2尊白石八臂明王像次之，而屬於二臂明王像的3尊青石像年代最晚；由此可知材質、形制之相異，也能反映製作時代先後。此批文物牽涉議題相當廣泛，為免駁雜，本文暫不討論白石三面八臂明王像及青石像，而將聚焦在年代最早的6尊白石像。③ 除此之外，學者指出，二十世紀初已出土之兩件臺座精美的白石菩薩型造像，不論風格、尺寸皆與此6尊白石像相類：一為1912年購藏自陝西，現收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八世紀中葉之唐漢白玉菩薩坐像（圖12，以下簡稱波士頓菩薩像）；一為個人藏菩薩型造像，其應為供養天女像（圖13），屢被視為與大安國寺白石像譜系相近甚或同組文物。④

② 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另一批數量較多的唐代密教文物，請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③ 三面八臂降三世明王與馬頭明王（圖7、8），後者年代學者以為應在780年左右，（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197）此二尊像年代相差應不遠；青石像3尊，為1尊遊戲坐明王（圖9）及2尊不動明王（圖10、11），年代更晚，應在九世紀上半葉；相關議題另文再論。

④ 出版於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London: Ernest Benn, 1925), vol. 4, pl. 583a, 583b. 時代同定為遼代。波士頓像博物館編號：12.63。博物館網頁：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28088/bodhisattva-on-a-lotus-throne?ctx=c421d3d7-fb87-4b8d-84e1-639d049e7538&idx=0（檢索日期：2022年3月15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194-195；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ürich: Kunsthaus, 1980), p. 215. 個人藏造像，為過去旅居美國馬里蘭州之香港藏家王梅生（Mason Wang）先生舊藏，蒙王先生2012年底告知，該像已於二十多年前出讓居住於美國之藏家，久未連絡。Angela Howard將其與安國寺出

臺大藝術學報資料庫

此6尊大安國寺造像雖然是世界各大博物館展覽常客，但是半世紀以來，由於早年圖版不清、風格與圖像複雜等問題，各尊製作年代及其圖像學之考訂仍待釐清，前述波士頓像與個人藏供養天女像相關問題亦待更深入討論。⑤ 本論擬先聚焦此6尊相關的製作年代及圖像學二議題，再考慮其圖像組合，最後再討論此批造像在東亞密教傳播史的意義。

一、製作時代

目前6尊白石造像之圖像名稱大致獲得共識為：一、無首如來，為寶生如來像（圖1）；二、一向名為菩薩頭像，但實應考慮其亦可能為天部像，因此稱其為菩薩型頭像（圖2）；三、持梵篋菩薩，因此目前多名為文殊，但如下所論，其實為女尊之金剛般若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四、上半身殘缺的菩薩型造像，亦應為女尊，如下文所論，可為天部之供養天女像（圖4）；五、二臂持金剛杵忿怒像，應為降三世明王像（圖5-1）及六、不動明王像（圖6）。⑥

土造像年代定在750－770年，見何恩之（Angela Howard）、何平南編纂，《中國古代石雕藝術》（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3），頁192-194。此外，有興慶宮景龍池出土白石聖觀音像，亦有學者以為與大安國寺造像為同組造像，如何恩之（《中國古代石雕藝術》，頁192-194）；確實，此尊亦為少見的密教造像，但是如註24所論，其時代實較此6尊白石像晚，故在此不擬討論。

⑤ 舉其要者有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Howard Rogers ed., *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New York: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1998)；東京國立博物館、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編集，《唐の女帝・則天武后とその時代展：宮廷の栄華》（東京：NHK，1998）；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中国国宝展》（東京：朝日新聞社，2004）；Annette L. Juliano et al.,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China, Selections from the Xi'an Beilin Museum, Fifth Through Ninth Centuries*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2007); Sabrina Rastelli ed., *China at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s* (Milano: Skira Editore, 2008).

⑥ 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42-156。早年如來因有馬座定名為馬鳴大士，金剛波羅蜜多菩薩為虛空藏菩薩，其後仍有研究者沿用。（李域錚編，《陝西古代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頁86-9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松原三郎首先論考此批造像年代上限只能是盛唐風格晚期的760年代。⑦ Roger Goepper與Helmut Brinker則認為菩薩型頭像（圖2）、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及降三世明王像（圖5-1）年代在760年左右。⑧ Angela Howard晚近在*Chinese Sculpture*一書則以為降三世明王（圖5-1）等二臂像在750年前後製作。⑨ 金申則認為出土造像整體年代在八世紀末至九世紀前期的中晚唐之際。⑩ Imann Lai提出部分白石尊像應為代宗永泰年間（765－766）文物。⑪ 近期常青專文則認為除了頭像（圖2）時代在天寶年間（742－755），其他白石像則多為開元八年（720）以後的開元年間（713－741）作品。⑫ 總結而言，關於此6尊造像年代，學者以為在八世紀初至九世紀初之間，時代上下相差近一世紀。六尊造像為：

⑦ 松原三郎，〈盛唐彫刻以降の展開〉，《美術研究》，257期（1969.3），頁20；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198。

⑧ 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pp. 212-222.

⑨ Angela Falco Howard et al., *Chinese Sculp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13-314.

⑩ 金申，〈西安安國寺遺址出土的密教石像〉，收入氏著，《佛教美術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04-115。

⑪ Imann Lai, *The Famensi Reliquary Deposit: Ic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 (Lond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6), p. 56; 相關章節已出版，請見 “The Marble Sculpture *Maṇḍala of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Excavated from Anguo Monastery in Xi’an: The Initiation of Vernacular Esoteric Buddhism in East Asia,” in Dorothy C. Wong ed., *Dynamics of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East Asian Buddhist Art, 5th-13th Century* (Wilmington: Vernon Press, 2022), pp. 156, 165. Imann Lai, “Esoteric Buddhist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ang China,” in Sabrina Rastelli ed., *China at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s* (Milano: Skira Editore, 2008), p. 77.

⑫ 常青，〈唐長安城大安國寺遺址出土密教造像再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10期（2019.10），頁10-14；文中圖8不動明王材質應為白石。此文後收入氏著，《長安與洛陽：五至九世紀兩京佛教藝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下，頁478-508，篇名更改為〈唐長安城大安國寺遺址出土密教造像芻議〉，其內容雖有所增補，但是仍維持安國寺出土造像為玄宗執政時期，不早於開元八年，不應晚至天寶之後的意見，見頁496。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無首佛陀（圖1），高67.5公分、寬40公分，結跏趺坐於七匹屈膝翼馬撐舉之須彌座蓮臺上。右手置膝施與願印，左手當心持衣角，著袒右肩袈裟。如來正、背面仍殘留菱格紋截金，背面殘存表現僧伽梨由布拼接而成的條狀墨跡；多處衣緣及蓮瓣都有貼金，出土時蓮座仍有「紅、綠、藍色塗於陰陽側面」，馬座鬃紅翅綠；⑬「馬赤」一如經典所說。⑭ 由手印和馬座可知，此尊為金剛界曼荼羅五方佛之南方寶生如來（Ratnasambhava）。⑮

二、菩薩型頭像（圖2），高15.7公分，高髻以卷草貼金寶珠頭飾束起，殘損耳璫亦有貼金。出土之初，唇上仍存鮮豔紅彩。

三、過去多被定名為文殊，但是實為女性尊像之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高74公分、寬36公分，典雅秀麗中流露凌然莊嚴。戴結有頭繒之頭盔，圓形開光露出其下髮絲；身著罕見女性尊像特有褖襡衣、披鎧甲，另輕籠披帛及披掛如聖紐之花環，下著裙；菩薩左手持一長莖蓮，上有梵篋，右手上舉胸前，腕部斷壞，結跏趺坐於三重須彌座卷草蓮臺。將於下節釐清其圖像學議題。

四、上半身殘缺的天部殘像（圖4），高41.5公分、寬33公分，腰部以上全毀，僅餘舒坐腿部，與複瓣須彌座卷草蓮臺，下裳留存團花狀截金裝飾，蓮臺與卷草紋仍殘存許多紅彩，過去被解讀為如意輪觀音。⑯ 但是此尊著裙，應為女尊。九世紀末法門寺金剛界大曼荼羅，有金剛嬉圖像為雙拳置髀（圖14-1），而日本自九世紀初即流傳有序之「現圖」金剛界九會微細會之金剛嬉圖像則未握拳，為左掌置髀（圖14-2），一如此尊。若考慮此件

⑬ 程學華，〈唐貼金畫彩石刻造像〉，頁61。

⑭ 唐代《五部心觀》完本，滋賀園城寺藏，收入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最澄と天台宗のすべて：伝教大師一二〇〇年大遠忌記念特別展》（東京：読売新聞社，2021），頁106。

⑮ 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66，頁227c。水野敬三郎，〈西安大安国寺遺址出土の宝生如来像について〉，《佛教藝術》，150號（1983.9），頁155。以下尺寸以典藏單位碑林博物館出版品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為準。

⑯ 金申以為此尊有持念珠之殘留，釋名為如意輪觀音；並以為此尊、寶生如來與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應為一組雕像群。（金申，〈西安安國寺遺址出土的密教石像〉，頁110-111。）但所謂念珠實為蓮臺排列有序之蓮蕊，據此解讀為觀音，恐難成立。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殘像製作於金剛界圖像還未相當確定的八世紀下半葉，自散盤及殘存左掌置髀推斷，或為供養天女，可為金剛嬉。⑰

五、二臂降三世明王（圖5-1），高75公分、寬48公分，怒髮衝冠，袒胸，雙臂披帛，下著兜提。頭轉向左，皺眉瞋目、咧嘴露齒、犬牙外露；右手執獨鈷金剛杵，上臂目前為修復後狀態，或因此之故，比例稍嫌短小。左臂平舉胸前，腕部斷壞，原或有持物。岩座左下方傷損嚴重，但仍可見雕出薄片層狀節理。鑲珠頭飾、項飾與右手腕釧仍有貼金，裝飾性極強。由持物「金剛杵」可定名為金剛手（Vajra-pāṇi），即持金剛者；其為裸身、忿怒相並以岩石為座，比對唐代文本、圖像可知為明王：「復畫忿怒尊，所謂勝三世，威猛焰圍遶，寶冠、持金剛」，勝三世即降三世（Trailokyavijaya），為降三世明王。⑱

---

⑰ 根本經典《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以下簡稱《金剛頂經》）並未述明其手印（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65，頁214b。）金剛界圖像在八世紀下半葉的變動見賴依縵，〈香積寺唐代奉獻小塔—中國出土的金剛界「五部心觀」系圖像〉，《故宮文物月刊》，314期（2009.5），頁89-91。

⑱ 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48，頁7b。此處《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以下簡稱《大日經》）所說為持金剛杵之二臂像，持物與此尊相符。《大日經》之英譯「勝三世」皆為 'Trailokyavijaya' 與「降三世」同。（Stephen Hodge, *The Mahā-Vairocana-Abhisambodhi-Tantra with Buddhaguhya's Commentary* (London: Routledge, 2003), p. 113; Rolf W. Giebel, *The Vairocanābhisambodhi Sutra* (Berkeley: Numata Center, 2005), p. 31）《大日經》並無梵文完本留傳。（塚本啟祥等，《梵語仏典の研究》，密教經典篇〔京都市：平樂寺書店，1989〕，頁179-182）然而目前流傳最廣的真言宗現圖胎藏曼荼羅，持明院之勝三世明王持金剛杵與三叉戟（圖5-2），與根本經典不同，為現圖獨有；安國寺此尊左手斷壞，原亦可持物。在據信較現圖更早的胎藏曼荼羅相關圖像，《大日經》翻譯者善無畏系《胎藏圖像》為最早版本，其勝三世持金剛杵與棒；時代稍晚之不空系《胎藏舊圖像》則僅右持金剛杵，左結拳。（石田尚豐，《曼荼羅の研究》，研究篇〔東京：東京美術，1975〕，頁85-87）陝西扶風法門寺出土，咸通十二年（871）金剛界寶函鑿刻之降三世明王，亦為僅持金剛杵，左手結拳之二臂像；（Imann Lai, *The Famensi Reliquary Deposit: Ic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 pp. 153-155）碑林博物館定名此尊為金剛造像，但是其英文品名為不動（Acala），見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7。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六、不動明王像（圖6），高55公分、寬40公分，挺直上身盤坐瑟瑟座，頭部、左腕斷毀。袒右肩斜纏天衣，下著兜提，另有披帛纏右肩自背搭繞左肘，瓔珞、臂釧與腕釧莊嚴；雖然過去已被定名不動明王，但是仍缺乏圖像學上的解讀。其右手持火光熊熊金剛劍，劍首為金剛杵造型；雖無首，但是仔細觀察左肩殘有鬚狀髮梢（圖6-2），肘下另有繩索（圖6-3）。《大日經》云：「不動如來使，持慧刀罥索，頂髮垂左肩，安住在磐石。」據此可推斷為不動明王無誤。⑲

此外，波士頓菩薩像（圖12），高77.5公分、寬32公分，怡然自得地趺坐華麗三重須彌座蓮臺，肩下右臂與左下臂斷壞。從依附於耳邊殘存的一段蓮莖透露，左手原應持一長莖蓮，其上原或有其三昧耶（梵：samaya，本誓）型，即其本誓之象徵符號。

個人藏菩薩型造像（圖13），高72（含臺座31.5）公分、寬36.5公分，筆者未有機會目驗，但從現有資料觀察，臉頰豐腴，鼻尖應有後補，其天衣斜纏左肩方式，與波士頓像接近，著裙，雙足間可清楚得見下襬貼身，一足屈膝微豎，閒適地趺坐於三重須彌座蓮臺。造像腰部斷裂後再修補，雙手皆有復原或後補；復原之左拳置髀，雖然與下臂無法完整接合，但色澤與整體造像相類；右臂自肘部損壞，有腕釧之右掌，色澤較白、尺寸偏小。此像散盤、著裙，右手殘、左手握拳，相當罕見，卻與前述供養天女殘像相似（圖4），推測為供養天女的可能性較大。

此批大安國寺造像特徵之一，是半數有裝飾華麗繁複蓮臺，此亦為波士頓像及個人藏供養天女像特點，造像與臺座都承載了許多風格上的特色，以下將先以風格分析方法分論，考慮其製作年代問題。

（一）造像風格分析

寶生如來像（圖1），胸肌平緩、肩膀不甚寬厚，整體重心在微微突起的下腹；袈裟衣褶以高陽刻線表現，使衣袍顯得厚重，體軀變化較不明顯，衣

⑲ 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第18冊，密教部一・848，頁7b。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紋變化規律，線條鬆緩，繁複而不亂。此風格與八世紀上半葉雙肩、胸膛雄厚，挺勁偉岸的芝加哥博物館藏神龍元年（705）彌勒倚像，東京書道博物館藏景雲二年（711）阿彌陀佛等造像，⑳ 或山西省博物院藏無垢淨光塔基出土天寶十一年（752）鼓漲飽滿的釋迦像不同（圖15-1）；㉑ 然而卻與敦煌148窟大曆十一年（776）肩胸不寬、下腹微凸的月光菩薩（圖16）或同窟北壁歡喜藏摩尼寶勝經變，主尊如來身體結構趨近塊狀扁平、肌肉起伏不明顯的造像相類。㉒ 而寶生佛像衣褶與八世紀上半至中期造像簡潔、線條緊勁、細淺的衣紋亦不同，相反地其厚重衣袍，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天寶五載（746）定縣邸延果等造佛像、天寶九載（750）二佛並坐像，及前述天寶釋迦佛僧衣逐漸變厚的趨勢相當一致。㉓ 其次，寶生佛覆蓋左肩重複折疊的僧衣（圖15-2），以圓緩線條表現，傳達布帛的柔軟與量感，亦可見於天寶釋迦佛裳懸座（圖15-3）；綜合上述討論，此尊像應如Goepper等人所言，推斷為八世紀60年代較為合理。

2尊白石明王像（圖5-1、6），工匠以嫻熟技巧表現各種細節，降三世像右手持杵高舉至身後，胸膛鼓漲、腹肌收束，生動表達提氣即刻出擊的瞬間（圖5-1）；不動明王胸肌結實，但下腹略為肥滿（圖6-1）；兩者裸露的軀幹皆可區分胸膛、上腹及下腹，而略為鬆軟的下腹，更進一步傳達了肉體圓潤肌理。其次，無論是降三世自肩部飄盪至岩座，供養天女殘像後背的披帛（圖4-3），或纏繞於不動明王胸腹之天衣，在衣褶變化上，工匠皆鑿出類似如來像較深之陽刻線表現。此外，如來與二明王下裳衣褶，皆自膝頭擴散到臺座，以左右對稱，且往外逐漸深刻的弧形線條表現。不過，如來像衣褶相

⑳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1690/maitreya-buddha-mi-le-%E5%BD%8C%E5%8B%92%E4%BD%9B（檢索日期：2020年7月15日）。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圖版編三，頁674-676。

㉑ 史岩主編，《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4，隋唐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版說明，頁16。

㉒ 彭金章主編，《密教畫卷》，《敦煌石窟全集》，卷10（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頁37、51。

㉓ 李靜杰、田軍編著，《定州白石佛像》（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19），頁634、636-639。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明快清晰，二明王下襬則在足脛下層層重疊，再如扇形散開，此較為複雜的線條，視覺上平衡了明王的衝冠怒髮，避免頭重腳輕的視覺效果。而二明王（圖5-1、6-1）與供養天女殘像（圖4-1、4-2）皆可見如波浪翻起的褲頭或裙頭，及臍下圓雕蝴蝶結；事實上如來左手所捉衣角，亦傳達與蝴蝶結相似之厚重柔軟質感。㉔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輪廓精確犀利，身軀細瘦拉長、扁平，比起前述山西省博物院藏天寶年間釋迦佛像（圖15-1）更接近莫高窟大曆十一年造像（圖16）。為表現經典所說女尊服飾輕柔質地，腹前以較細矮陽刻線，臍部則以陰刻衣褶，傳達上衣蟬翼般的輕透感。腿部襞褶如前述佛與明王像，自膝頭左右對稱緩瀉至蓮臺，只是此處亦以低矮弧線雕飾，表達輕薄質感；下擺邊緣沿雙腿有一圈貼金滾邊，透露此為裙。但是此尊與降三世肘後披帛，皆是以有數道平行突起線之條狀石塊表現襞褶，實顯厚重（圖3、5-1）。

菩薩型頭部造像（圖2）較上述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豐腴，寬額豐頤，但又不失娟秀，兩者技法類似；長眉皆以斜刀刻出高起的眉棱骨，再鑿出彎曲柳葉眉，如蓮苞的眼瞼往下俯視。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1）鼻頭有修補痕跡，但仍可觀察出兩尊鼻樑皆高挺小巧，下接稜角分明小嘴，嘴側皆有

㉔ 前述三面八臂降三世明王（圖7，高75、寬47公分），實介於圓雕與高浮雕間的作品；其工藝似與二臂白石像相仿，但是若仔細觀察，其右足彷彿還未完全從石塊中雕鑿完成，兜提、飄帶等襞褶表現較為凌亂；白石二臂寶生如來、降三世明王、不動明王等之衣褶如上所述，都以明快、具表現力陽刻線再現，兩尊白石二臂明王下裳束帶垂墜至近岩座邊緣時，收束翻轉，創造開闔律動與立體效果；八臂降三世像雖然亦有同類設計，但是在布帛轉折收束處，並非三維立體表現，其右腿外側飄帶之再現亦屬平面化思考，不似白石不動明王之腿側飄帶，堆疊後自然地垂下岩座，進一步創造空間效果；三面八臂降三世明王之工匠，明顯地無法駕馭此類設計語彙，相當可能是擬模仿時代較早的白石二臂明王像，但是力有未逮。從技法觀察，八臂降三世明王與白石二臂像非同期作品，時代應較晚。另外註4提及之興慶宮景龍池出土白石二臂聖觀音像，其整體造像風格、開臉皆與學者定年在780年左右之安國寺三面八臂馬頭明王類似，只是較精緻；最容易觀察到的是，兩者僅以形式化陰刻線刻畫下裳褲頭，而白石二臂像則精細雕鑿出立體波浪狀褶痕，並不厭其煩雕造立體蝴蝶結如前述，因此白石聖觀音像與此組白石二臂像製作時期並不相同。

臺大藝術史研究資料庫

因豐頰形成之深紋；豐厚下頷接厚實頸部形成俗稱雙下巴，則又與降三世像（圖5-1）類似。菩薩型頭部造像耳後頭繒，與前述供養天女殘像（圖4-1）、明王像（圖5-1、6）臍下蝴蝶結如出一轍，進一步透露其近親關係。綜上所述，此六尊造像之技法、風格、裝飾語彙等皆有異曲同工之妙，年代應近似。

德國學者Goepper與Brinker最早將波士頓像（圖12）與大安國寺造像連結，年代定在750年左右；松原三郎譽其為長安派大理石像的頂點，為玄宗朝（712－756）八世紀後半作品。㉕ 波士頓像髮髻高大，臉如滿月，眼瞼豐厚，眼尾往下拉長，整體臉型、軀體比起大安國寺像更為厚實；胸肌成段鼓起，腰肢纖細，相形之下，雙腿比例較小，與被定年為開元年間726－740年製作的天龍山第十七窟菩薩像近似；㉖ 但是波士頓菩薩像更接近年代較晚的山西省博物院藏天寶十一年（752）釋迦像（圖15-1）。釋迦像頭部與胸膛渾圓鼓漲飽滿，缺乏細節；相形之下，波士頓菩薩像多肉的臉龐與壯碩的胸膛，仍保留肌肉的柔軟，尚未達到山西天寶佛鼓漲緊繃、彷彿到達極致的境地，應是在八世紀40年代前後造像。波士頓菩薩像製作年代較早，在形式上若非大安國寺造像直接模仿的對象，也有著相當近親的關係。

而個人藏供養天女像（圖13）微向左低頭，五官集中，雙眼下視如蓮苞，鼻挺嘴小，豐頰頷厚，與前述菩薩型頭像（圖2）雷同；頭飾之上層束有一如波士頓像（圖12）之寶冠，下層則似菩薩型頭像為寶珠卷草紋主飾，耳後亦綁有蝴蝶結。耳璫造型則如降三世（圖5-1）之莊嚴。身軀已不似波士頓像豐厚，而是趨向於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之扁平；一如寶生如來等像以深刻陽刻線表現腿部衣褶（圖1、4、5-1、6），並在近膝處形成逗號形；下裳腰際波浪狀外翻及臍下厚實蝴蝶結，皆如前述供養天女殘像及明王造像。此個人藏供養天女像裝飾細節及風格，與此六尊像實有許多雷同之處。

㉕ 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pp. 212-213.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本文編，頁194-196。

㉖ 顏娟英，〈天龍山石窟的再省思〉，收入臧振華主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1997），頁879。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二）臺座風格分析

寶生佛（圖1）、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供養天女殘像（圖4）此3尊安國寺造像，以及波士頓像（圖12）、個人藏供養天女像（圖13）皆有裝飾繁複蓮臺下托牙座，以蓮座、束腰及開有壺門的牙牀三部分組成。束腰部分，除了如來像（圖1）以馬及卷葉莨苕紋（Acanthus）為裝飾紋飾，其餘皆以卷葉莨苕等植物紋為裝飾主體。首先討論年代較早的波士頓像。

波士頓像複瓣蓮座（圖12），一如寶生佛（圖1）、供養天女殘像（圖4），蓮瓣皆以貼金連珠紋滾邊；而蓮瓣內有寶相花，又與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類同；蓮蕊不似大安國寺像粒粒分明、排列有序，但表現動勢順暢。束腰滿飾纏枝莨苕紋，正面右上方一枝莨苕垂直向下至牙座，即往後翻轉阻斷視線，臺座中心以一莖膨大莨苕紋構成如鼓型之焦點，再以往左莖脈連結各組紋飾，引導視覺行進及於後方；莨苕紋高、低浮雕明暗反差大，葉片翻轉、捲曲如富有彈性的卷渦，動態十足，被譽為唐代的巴洛克藝術。㉗類似紋飾與意趣可在讓皇帝李憲（679－742）墓石槨（圖17）或石台孝經（圖18）石刻等八世紀40年代作品窺見。㉘結合造像與臺座一起考慮，應為天寶

㉗ 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p. 215.

㉘ 天寶元年（742）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石柱刻海石榴莨苕等紋飾，繁茂卷草捲曲變化極富動態（圖17）。此類尾端肥厚，捲曲如鳥羽之卷草紋，在開元二十九年（741）燃燈石臺石刻亦可得見；（張鴻修，《隋唐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101）比起開元年間，輪廓明晰可辨的紋飾，如興福寺碑碑側（721）或大智禪師碑側（736）疏朗有致紋飾，740年代作品畫面幾乎滿飾無圖、地之別，充滿對動勢的追求，華美喧鬧。除此之外，天寶四年（745）〈石台孝經〉石碑上蓋浮雕，以對稱卷渦紋構成蒸騰靈芝雲氣紋（圖18），下承碑石的石台，則有線刻柔軟翻動的卷草海石榴紋，兩者被形容為「有如風呼雲湧」、「活潑、蓬勃」。（李域錚編，《陝西古代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頁181）可見此際，除了延續前代有力引導視覺方向之對波紋（揚之水，〈對波紋源流考〉，收入氏著，《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93-99），紋飾更追求以翻騰卷渦強調動勢的風格。天寶年間密教祖師凋零殆盡，僅有不空金剛較為活躍，若考慮此造像為密教造像，及後述其自錫蘭歸國，三年後赴南海的歷史背景，波士頓菩薩像年代，應或在天寶五年至八年間（746－749）。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年間作品，製作年代早於大安國寺此批造像。

大安國寺造像若非直接模仿波士頓像，兩者也有著相當近親關係，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束腰紋飾為莨苕海石榴紋，佈局相似。然而此女尊像臺座正面，是以四莖大小相仿卷葉紋，組成彷彿上述以一莖膨大莨苕葉構成之焦點；其下座緣，以同樣細長、未有方向性暗示的莨苕紋及貼金石榴裝飾，而自蓮座兩側下垂至牙座的天衣，更增添束腰裝飾如一幅靜物框景之感。此外，大安國寺造像莨苕紋多以細長、大小差距不大之卷草構成，並未有強烈律動感。前述八世紀40年代作品，對於「動勢」的追求，及以大小、明暗對比，創造光影變化的效果，並非此際藝術創作風格的重點。肅宗朝末年之玄宗泰陵、肅宗建陵旁的神道天馬翼翅（圖19）以及廣德二年（764）〈爭座位碑〉側線刻卷草紋（圖20），亦可見金剛波羅蜜多像臺座相似的語彙，也就是皆以一首尾粗細少變化、末端浮雕卷曲的長柄型紋飾，代表一莖莨苕或翎尾。㉙

供養天女殘像（圖4）蓮臺束腰佈局與風格，一如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但焦點改為蓮蓬、蓮蕊俱全的盛開蓮花莨苕紋。臺座前方有3朵如意雲紋狀卷草懸垂於邊緣，寶生如來（圖1）基座，亦有此類打破邊緣界限的卷草紋。李格爾（Alois Riegl，1858－1905）提出的「藝術意志」（Kunstwollen）或稱為審美衝動的概念，認為風格的變化，體現不同時代對於理想美的改變；確實，大安國寺造像及前述〈爭座位碑〉線刻等作品，無論描繪動物或植物，所追求的風格、風尚皆相類。㉚ 如上所論，此6尊造像，

㉙ 上元二年（761）四月，玄宗駕崩，始「追奉先旨，以創寢園」，廣德元年（763）下葬泰陵；寶應元年（762）四月肅宗崩，隔年（763）葬於建陵。（劉向陽，《唐代帝王陵墓》（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頁193、211）Ann Paludan, *The Chinese Spirit Roa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igs. 132-134.

㉚ Otto Pächt; David Britt trans.,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 (London: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 1999), p. 70. 藝術意志（Kunstwollen）實可用風格（style）一詞取代，但是李格爾想要攫取比「風格」更深層的意義，參見Christopher S. Wood,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S. Wood, *The Vienna School Reader: Politics and Art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1930s* (New York: Zone Book, 2000), p. 1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論自造像本體或臺座觀察，有著共同的裝飾手法、語彙，所欲追求的風格亦似，應是在八世紀60年代所作。

個人藏供養天女像（圖13）之須彌座可謂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與供養天女殘像（圖4）臺座之綜合，正面鼓型焦點亦是以四莖細瘦莨苕裝飾，與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雷同，但是以莨苕蓮花紋裝飾則一如供養天女殘像（圖4）。總結而言，出土時間約早半世紀之個人藏供養天女像，其臺座細節與大安國寺白石二臂造像相當類似，筆者認為應可考慮其與此批大安國寺文物即使非屬同一組造像，亦應為同時代作品。綜上討論，從造像與臺座觀察，皆透露波士頓像年代應最早，為玄宗天寶年間八世紀40年代作品，大安國寺6尊像及個人藏供養天女像則是安史之亂後，八世紀60年代之作品。

二、圖像學

（一）持梵篋女尊金剛波羅蜜多菩薩

大安國寺出土6尊白石造像圖像學釋名已如前述，惟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圖3）圖像複雜而罕見，其定名更牽涉到整組圖像組合之關鍵問題。此尊因手持象徵諸佛說法的梵篋，多被定名為文殊菩薩，㉛ 但是水野敬三郎早年即很有見地的指出，此尊應為「波羅蜜菩薩」，究其原因，實因此尊著東亞密教圖像常見之女尊服飾「褵襹衣」。㉜ 尊像戴冑，即頭盔，長袖內襦在上腹以結固定，肩、胸披鎧甲，長袖以臂護緊紮於下臂，而讓肘部可自由屈伸的

㉛ Helmut Brinker and Roger Goepper,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p. 212. Howard Rogers ed., *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p. 156. Annette L. Juliano et al.,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China, Selections from the Xi'an Beilin Museum, Fifth Through Ninth Centuries*, pp. 114-116. 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3。

㉜ 水野敬三郎，〈西安大安国寺遺址出土の宝生如来像について〉，頁152。在東亞密教傳統，著褵襹衣菩薩一般為女尊像，此種衣飾以覆蓋身軀為特色，見密教辭典編纂會編纂，《密教大辞典》（京都：法藏館，1983），頁243。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寬大袖筒，在肘間層疊翻摺如團花褶紋，即是裲襠衣特色。此類服飾實仿武人裝束，惟未戴護腹，露出女子蜂腰，配合輕薄衣褶，強調其為女尊。㉝

女尊著鎧甲，唐代經典明確記錄此類圖像者僅般若波羅蜜多菩薩，其為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 pāramitā）之擬人化形象。般若（Prajñā）意譯「智慧」，波羅蜜（Pāramitā）意譯「到彼岸」，指智慧如船將眾生度往涅槃彼岸。㉞ 在漢文經典中「般若」、「波羅蜜多」、「波羅蜜」菩薩皆指涉同一類尊格。《大毘盧遮那經廣大儀軌》述般若波羅蜜多為「身被堅甲冑」一面六臂像，除了雙手結說法印，另左手持經函、做定印，右手結無畏印與與願印（圖21）；㉟ 後三種手印是一般佛菩薩常結之手印，「經函」則代表佛說法之智慧結晶，為密教中般若波羅蜜多的三昧耶形，是其根本象徵。㊱ 其他唐代經典，雖未言明般若佛母身著甲冑，但是亦皆明述為女尊。《陀羅尼集經》（653－654）卷三記載似「天女相」，左手持經函，右手置膝施無畏印，「身上著羅錦綺，繡作裲襠，其腰以下著朝霞裙」。㊲《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以下簡稱《仁王經》）之儀軌述其「為一切諸佛之母……左

㉝ Imann Lai指出此尊著裲襠衣亦著甲冑，應為《仁王經》系統之波羅蜜多菩薩。（Imann Lai, “The Marble Sculpture *Maṇḍala of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Excavated from Anguo Monastery in Xi’an,” pp. 158-161) 同樣地披鎧甲之解讀另可見齊慶媛：「密教文殊菩薩像，胸部偏上披鎧甲」，請見氏著，〈宋遼金時期菩薩像造型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15），頁11。裲襠衣有披鎧甲與未有鎧甲之分，見井上曙生，〈経典と図像と仏像：裲襠衣を中心にして〉，《密教図像》，5號（1987），頁55-63。女尊及裲襠衣之相關議題複雜，另文申論。

㉞ Chinese-Sanskrit Glossary 漢梵語彙: http://www.tibetanbuddhist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title=Praj%C3%B1%C4%81（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6日）

㉟ 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經廣大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51，頁106b。此儀軌收在圓載《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宗叡撰，《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74，頁1108a。）最晚在九世紀中已成立。

㊱ 頼富本宏、下泉全暁，《密教仏像図典》（京都：人文書院，1994），頁88。

㊲ 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901，頁805a。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手當心持般若梵夾。右手當乳作說法印」。㊳ 大安國寺出土此尊造像著質地輕薄衣衫，或即為表現前述經典所說「著羅錦綺、朝霞裙」，一手持其三昧耶形梵篋，另一手舉胸前斷壞，可做說法印、無畏印或持物，故推斷為般若波羅蜜多類造像並無扞格。

（二）《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及其曼荼羅

1. 經典

唐土最早論及般若波羅蜜多形象，為七世紀中葉翻譯的《陀羅尼集經》，但是經中所說尊像甚多，卻不一定在此時期形成信仰。般若波羅蜜多佛母的傳播，應與年代較晚，不空金剛（Amoghavajra，705－774）及其弟子編纂的《仁王經》及相關經疏有關，事實上，也是此6尊造像之所出經典。

代宗永泰元年（765），不空奏請重新翻譯《仁王經》。㊴ 此經過去已有姚秦時期（即後秦，384－417）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多經》等版本，皆為中國撰述。㊵ 不空再治本《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在經名中畫龍點睛增加「護國」二字，相關儀軌有四本，首次介紹了五大明王此組具

㊳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7b。

㊴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8冊，般若部四・246，頁834a-844c。

㊵ 鳩摩羅什譯，《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8冊，般若部四・245，頁825a-834a。版本相關問題見賴富本宏，《中国密教の研究：般若と賛寧の密教理解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東出版社，1979），頁160-163；Charles D. Orzech則有研究羅什、不空本專著，見氏著*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8).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有東亞特色的忿怒尊群像。㊶ 羅什本僧俗傳譯、朝野提倡已頗見流行，不空本譯出後，相關各種靈驗事蹟更見流傳，距中唐不遠的《大宋僧史略》即留下帝王晝夜供養《仁王經》的記載。㊷

不空本主要是將羅什本之第七〈奉持品〉舊譯之五大力菩薩，改以金剛界曼荼羅所說五菩薩，並增加〈仁王般若陀羅尼〉。〈奉持品〉中提及國土中有七難，其中第七難為四方賊來「侵國內外，兵戈競起百姓喪亡。」隨後述及若諸國王建立正法、護持三寶者，佛則令五方菩薩眾往護其國，即東方金剛手菩薩、南方金剛寶菩薩、西方金剛利菩薩、北方金剛藥叉菩薩以及中央金剛波羅蜜多菩薩。㊸ 羅什本所述金剛吼、龍王吼等五大力菩薩，尊名兇猛，又持千寶相輪等銳器；不空新譯本所述之五菩薩反而是寂靜像，不似羅什本菩薩具有威嚇力，或因此之故，大曆元年（766）編纂之《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以下簡稱《仁王經儀軌》）中增述，國家有難時，除了五菩薩，另有五忿怒尊及其眷屬天王眾等將前來營救。㊹

㊶ 4本相關儀軌，前3本皆註記為不空金剛翻譯：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3-519；不空譯，《仁王般若念誦法》，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5，頁519-522；不空譯，《仁王般若陀羅尼釋》，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6，頁522-525；良貴撰，《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33冊，經疏部一・1709，頁429-523。

㊷ （北宋）贊寧撰，《大宋僧史略》，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4冊，事彙部下・2126，頁253c。松長有慶，〈護國思想の起源〉，《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9期（1966.12），頁72。

㊸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第8冊，般若部四・246，頁843a-c。不空本之其他改動見Charles D. Orzech,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pp. 161-167, 275-288.

㊹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4bc。編纂年代見山口史恭，〈仁王陀羅尼念誦儀軌について〉，收入大正大學真言學豐山研究室加藤精一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真言密教と日本文化》，下（東京：ノンブル，2007），頁11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仁王經儀軌》述「五菩薩依二種輪現身有異，一者法輪，現真實身，所修行願報得身故；二教令輪，示威怒身，由起大悲現威猛故。」㊺「威怒身」即明王，依此理論被視為五菩薩的忿怒化現，分別為東方八臂降三世明王、南方八臂軍荼利明王、西方六臂大威德明王、北方四臂烏樞沙摩明王和中央二臂不動明王。其多臂多首威猛形象，超越羅什本五大力菩薩。㊻

關於如何立像及建立《仁王經》相關曼荼羅，僅見於《仁王經儀軌》，據此主尊為金剛手等五菩薩，以金剛界內外八供養天女與四攝智為眷屬，製作三昧耶形的土壇曼荼羅，短時間即可完成。㊼但是若要開壇祈攘，《仁王經儀軌》提及要分別結佛部、菩薩部及金剛部三昧耶印，隨後請聖眾降壇，「用前三部印契及誦真言……即前滿空三部聖眾，各依本位不相障礙寂然而住。」即行法時，要迎請「佛、菩薩、金剛」三部聖眾。一般是以觀想法行之，但是若將前述主尊僅為五大菩薩之曼荼羅，增廣為三部諸尊，亦合經典

㊺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4a。《仁王經》這段論述常被引申為佛為「自性輪身」、菩薩為「正法輪身」、明王為「教令輪身」之「輪身」理論，(Charles D. Orzech,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pp. 156-158.) 但是「自性輪」與「教令輪」用語，最早出自傳不空譯，《攝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經計一法中出無量義南方滿願補陀落海會五部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儀形色執持三摩耶幖幟曼荼羅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20冊，密教部三・1067，但是此儀軌，在唐代經錄、日本入唐八家請來目錄或錄外目錄皆無紀錄，即使是中國著述，也不易回溯至唐代。（向井隆健，〈不空「摂無礙経」をめぐる問題〉，《印度学仏教学研究》，60期〔1982.3〕，頁801-804）。前述三種「輪身」的論述，應是日本平安朝末期十四世紀中葉才完成。（下松徹，〈東寺講堂の諸尊と三輪身說〉，《密教文化》，157期〔1987〕，頁58）雖然有學者以為，必須考慮古來佛教代代相傳的口述傳統，上述思想應早在空海時期已然形成，只是未有文字紀錄。（田中公明，〈胎藏曼荼羅〉，收入高橋尚夫等編，《空海とインド中期密教》〔東京：春秋社，2016〕，頁232-233）。

㊻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4a-515a。賴富本宏，〈明王の成立〉，松長有慶編著，《インド密教の形成と展開—松長有慶古稀記念論集》（京都：法藏館，1998），頁342-343。

㊼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5a-c。

臺大博物館資料庫

所述。畢竟滿足「護持國界令無災難」之願力者為金剛部眾，為達到《仁王經》所說之「護國」除災，壇法本尊囊括金剛部忿怒明王，可更視覺化密教退敵的神秘力量。㊽

而迎請聖眾之首佛部，為定義此曼荼羅的法界力源流，《仁王經儀軌》開宗明義即引「依三藏所持梵本《金剛頂瑜伽經》云」，據此可知，此即是以金剛界為其宇宙觀，佛部是以金剛界曼荼羅所說五方佛為代表。㊾ 密教修法特色是手結手印、口頌陀羅尼、作意觀想，結合「身、口、意」三密，若曼荼羅僅造五菩薩像，而無歸命主尊大日如來等五方佛及護國除災之五大明王，未免有所缺憾。若主尊為佛、菩薩、金剛部，則三部聖眾俱全，即為後世東亞密教所說之「三輪身」（表1）。㊿ 此類三部俱陳的《仁王經》曼荼羅，以九世紀京都東寺講堂立體曼荼羅為最著名代表。(51) 此三部主尊若再加上經典所說八供養、四攝智等12尊眷屬，此增廣之曼荼羅則共有27尊造像。

㊽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第19冊，密教部二・994，頁516bc。

㊾ 即不空重新編纂之《仁王經》是以金剛界曼荼羅來定義其宇宙世界，見藤善真澄，〈密教と護國思想〉，收入賴富本宏、立川武藏編，《中國密教》（東京：春秋社，1999），頁147-149。

㊿ 詳註45。Imann Lai, “The Marble Sculpture *Maṇḍala of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Excavated from Anguo Monastery in Xi’an,” pp. 163-165.

(51) 高田修，〈東寺講堂の諸尊とその密教的意義〉，《美術研究》，253號（1968.3），頁1。目前所見五方佛與五菩薩的中央金剛波羅蜜多6尊因燒失，為後補。（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国宝東寺—空海と仏像曼荼羅》〔東京：読売新聞社、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19〕，頁176）。

臺大藝術史資料庫

表1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之五方佛、菩薩與明王

形象方位	法界力 （自性輪身）	法輪 （正法輪身）	教令輪 （教令輪身）
東	不動如來 Akṣobhya	金剛手菩薩 Vajrapāṇi ㊷	四頭八臂降三世金剛 Trailokyavijaya
南	寶生如來 Ratnasambhava	金剛寶菩薩 Vajraratna	八臂甘露軍荼利金剛 Kuṇḍali
西	彌陀如來 Amitābha	金剛利菩薩 Vajratīkṣṇa	六足金剛，即大威德明王 Yamāntaka
北	不空成就如來 Amoghasiddhi	金剛藥叉菩薩 Vajrayakṣa	四臂淨身金剛（即烏樞沙摩明王）Ucchuṣma
中央	大日如來 Vairocana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 Vajra-prājñāparamitā	不動明王 Acala

2. 大安國寺立體曼荼羅造像

雖然學者以不空曾上貢琥珀寶生如來一軀的紀錄，提出寶生如來可為獨尊像，㊸但是大安國寺這批尊像，金剛界如來、明王與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並俱，尺寸亦相近，應做一組造像考慮，此類組合僅出自《仁王經儀軌》。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應為菩薩部中央的金剛波羅蜜多，《仁王經儀軌》云：「手持金剛輪放五色光。」㊹如前所述，此尊造像一手執梵篋、一手舉胸前斷壞，依此儀軌，可為持法輪。而此儀軌以金剛界為基礎，五方菩薩皆冠以「金剛」字首，因此，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亦不例外。以《仁王經儀軌》三部體系重建，大安國寺出土造像，有佛部南方寶生如來，菩薩部有中央金剛波

㊷ 即金剛界金剛部上首菩薩金剛薩埵（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第18冊，密教部一・865，頁208c），其圖像為手持金剛杵（vajra）故亦可名為持金剛者（Vajra-pāṇi），即金剛手。

㊸ 水野敬三郎，〈西安大安国寺遺址出土の宝生如来像について〉，頁155。

㊹ 不空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第8冊，般若部四・246，頁843c。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羅蜜多菩薩，金剛部即忿怒明王，有中央不動明王及東方降三世明王，著裙供養天女殘像可為金剛嬉，以及菩薩部或天部之頭像。而前述此組造像之年代應在760－770年之間，《仁王經儀軌》應成立於766年，風格分析斷代與圖像學所依經典成立年代未相互牴觸。

然而儀軌所述明王為多面多臂像，其他唐代遺留之五大明王造像亦多為多面多臂像，為何此組造像採用二臂像？㊺ 究其原因，應是石質圓雕多臂作品，在當時有其技術上的限制。㊻ 此外，儀軌所述曼荼羅為可簡便繪製的各尊標誌土壇，並未要求以擬人化形象化現，或在外敵當前的緊迫時間下，是否能再現儀軌所述多面多臂像，應非不空教團此際關切的焦點。

此大安國寺出土6尊白石造像，尺寸相近，復原後總高在80公分上下，寬度則在30～48公分間，目前觀察，復原後佛造像較高，而天部像則較小。出土造像佔原曼荼羅五分之一強；而前述個人藏供養天女像若屬此組大安國寺造像，則為外圍之天部。由於缺乏大安國寺有相關密教塔院的資料，目前只能依據殘存有限的尊像，推測其安座空間組合。此立體曼荼羅原可能有27尊，三部各5尊，主尊依金剛界曼荼羅各部方位排列，內外四供養及四攝眷屬

㊺ 流傳到日本的數只唐代密教法器金剛鈴，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五大明王鈴，與奈良國立博物館所藏四大明王鈴，鑄造了《仁王經》系統之忿怒尊，除了不動明王，皆為多臂像。（岡崎譲治，〈仏像鈴所顕の五大明王像—円珍請来図像との関連〉，《美術史》，61期〔1966.6〕，頁18-32）而九世紀上半葉之四川磐陀寺尊勝曼荼羅，其降三世明王亦為三面八臂。（朴亨國，〈大阪金剛寺金堂の金剛界大日・不動・降三世の三尊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四川省盤陀寺石窟の大日三尊龕の紹介を兼ねて〉，收入氏著，《ヴァイローチャナ仏の図像学的研究》〔京都：法藏館，2001〕，頁402-404）而最著名的《仁王經》相關造像，為日本京都東寺講堂之立體曼荼羅，應是以空海自唐請回「仁王經五方諸尊圖」為粉本，其降三世明王等亦為多面多臂像。（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国宝東寺—空海と仏像曼荼羅》，頁188）

㊻ 例如年代較晚的前述安國寺白石三面八臂馬頭、 降三世明王皆有背屏，尤其降三世的部分手部及腿足之雕造，實屬高浮雕而非圓雕技法，其他唐代多面多臂像，如前述四川磐陀寺之降三世明王之八臂，亦是緊貼其後壁面如高浮雕，但是與其成組之二臂不動明王，則為圓雕。大曆初年雕鑿此組安國寺二臂像的工匠，或曾挑戰圓雕白石多臂像，但以失敗告終，直至年代稍晚，工匠方發展出利用明王烈焰熊熊的圖像學特色，以火焰為背屏支撐多臂，以類似高浮雕的技法成功創造出多面多臂像。

臺大藝術圖書資料庫

在外圈（圖22）。尊像尺寸不大，完成之初，安座在空間如山西五台山唐代南禪寺內，寬8.4公尺、深6.3公尺正殿壇座，大致足夠；亦可考慮安座於類似青龍寺遺址四面闊、進深都是五間，具內、外堂之早期殿堂內堂。[57]

三、代宗朝護國瑜伽密教的興起

東漢末年密教相關經典已傳入中國，多為持誦特定陀羅尼（咒語），以祈求降雨、消災解厄、鎮敵驅邪等追求現世利益。初唐因印度僧人菩提流志（Bodhiruci，572－727）、阿地瞿多（Atikūṭa，生卒不詳）、寶思惟（Maṇicintana，？－721）等印度、西域僧人來到中國，在短時間內傳譯大量重要的密教經典，有的內容頗為龐大駁雜，主要在讚頌諸佛菩薩之功德利益，尤其是各種變化觀音之不可思議威力。[58]

唐玄宗開元年間，俗稱之開元三大士赴唐，為密教對中國的傳播帶來新一波高峰。梵僧善無畏（Śubhakarasiṃha，637－735）、金剛智（Vajrabodhi，669－741）先後抵華，前者於開元十二年（724）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七卷（《大日經》），為胎藏曼荼羅根本經典；後者於開元十一年（723）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二卷；不空金剛亦是在開元中隨舅抵唐並師從金剛智受灌頂，天寶末年（753－755）於河西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三卷（《金剛頂經》），為金剛界曼荼羅根本經典。[59]《大日經》與《金剛頂經》屬印度中期密教經典，在密教的教理思

---

[57] 楊鴻勛，〈唐長安青龍寺密宗殿堂（遺址4）復原研究〉，《考古學報》，1984年3期，頁389-393。

[58] 賴富本宏，〈中国密教の流れ〉，收入賴富本宏、立川武藏編，《中国密教》（東京：春秋社，2005），頁16-23。更廣泛研究見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130-243。

[59] 前述其師所譯為金剛界成就法。善無畏譯，《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第18冊，密教部一・848，頁1a-55a；金剛智譯，《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第18冊，密教部一・866，頁223b-253c；不空譯，《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第18冊，密教部一・865，頁207a-223b。兩部聖典素來並舉，據信為東亞密教代表性圖像，兩部曼荼羅之根本經典，因此有「盛唐之世，司教始完成，兩部純密，一時備足矣。」之說，見大村西崖，《密教發達志》（臺北：武陵出版社，1993），頁353。

臺大建築與古蹟資料庫

想、修法實踐以及尊格圖像都較整備，具體系性，講究三密瑜伽，以成佛為目的。[60]

上述三人雖然並稱為弘揚密教的「開元三大士」，但是事實上密教的傳播在玄宗朝（712－756）頗為周折。[61] 善無畏、金剛智在玄宗朝前期翻譯經典，為皇帝行祈雨、鉤召之事，然而玄宗的政策是削弱佛教勢力，其「留心玄牝，未重空門。」[62] 其後更下令外國蕃僧歸國，於開元二十九年（741）7月敕令允金剛智、法月（Dharmacandra，653－743）等返國，事實上即是逐客令。8月金剛智圓寂，不空從師命赴獅子國求法。[63] 此年正是皇帝下詔置多座玄元皇帝廟、置崇玄博士、修建道觀等，展開一連串支持道教的政策，有學者以為，此開創天寶年間（742－756）成為史上罕見試以道教治國的時代。[64] 不空於天寶五年（746）歸國，「進師子國王尸羅迷伽表，及金寶瓔珞、般若梵夾、雜珠、白氎等。」不空「入內立壇為帝灌頂」，看似重獲信任，但是天寶八年（749）皇帝再令「許歸本國」。[65] 不空行抵南海韶州，稱疾盤桓四年，至天寶十二年（753），河西節度使哥舒翰（699－757）奏請不空赴河西傳

---

[60] 野口圭也，〈インド中期密教とは何か〉，收入高橋尚夫等編集，《空海とインド中期密教》（東京：春秋社，2016），頁12-23。

[61] 周一良先生早年大著〈唐代密宗〉(Yi-liang Chou, “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 (1945.3), pp. 241-332.) 即為此三人《宋高僧傳》傳記之翻譯與研究。中文譯本見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收入氏著，《周一良集》，3（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1-152。

[62] 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著，釋依法譯，《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新北市：佛光出版社，1999），頁83。

[63] 贊寧等撰，《宋高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711c、712a；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57，頁878c;金剛智圓寂日期《宋高僧傳》有誤，請見周一良著，錢文忠譯，〈唐代密宗〉，頁64。

[64] Timothy Hugh Barret, *Taoism Under the T’ang*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1996), p. 59.

[65] 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712c。天寶八年「南海太守劉巨鱗坐贓，決死之。」（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223）；不空恐牽涉劉巨鱗一案而「許歸本國」，見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修訂版，頁335。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其與麾下武將及士庶數千人咸登道場受灌頂。《金剛頂經》等卷帙較龐大的密教經典，多在此武威時期所譯。[66]

安史之亂爆發後，天寶十五年（756）不空返回長安，肅宗（711－762、756－762年在位）素憑釋氏，在皇太子時期即與不空熟稔，密遣使者向其求祕密法以退敵，不空大弟子元皎（生卒不詳）亦隨駕靈武，深獲肅宗及皇后信任。即帝還京，「帝請入內，建道場護摩法。為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67] 但是肅宗同時亦禮無漏（生卒不詳）、大光（生卒不詳）等僧人，乾元二年（759）後，肅宗愈發傾心道士李含光（683－769）及鑽研祀事、道術的王璵（？－768），後者甚至拜相。[68] 肅宗晚年疏遠不空，並不利推展密教信仰。

代宗朝（762－779）初，廣德元年（763）吐蕃劫掠京城，皇帝被迫逃離長安；隔年又面對中興唐朝有功名將僕固懷恩（？－765）領吐蕃、回紇聯軍再次進攻京城，值此國難當頭，永泰元年（765）不空奏請重新翻譯《仁王經》。[69] 但是代宗即位之時即頒佈沙汰僧尼道士詔令，並非篤信佛教，或因此之故，《仁王經》4月譯罷，仍待大安國寺上座臨壇大德乘如（700－780？）「昧死敢以請聞」上表奏請，方允長安兩街法師誦持此經。[70] 然而同年當僕固懷恩無端暴斃、聯軍瓦解，10月「京師解嚴」，皇帝旋即於11月初，贈金剛智從散官最高品的一品「開府儀同三司」，不空為二品「特進試

---

[66] 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712c。

[67] 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713 a。

[68] 岩崎日出男，〈不空三蔵と粛宗皇帝〉，《密教学研究》，18號（1986.3），頁119-127。

[69] 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頁273。

[70] 圓照撰，《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56，頁751bc。乘如僧籍原在東都敬愛寺，廣德二年（764）不空奏請〈置大興善寺大德四十九員〉，轉隸長安大興善寺（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30b），應早與不空熟識，隔年為大安國寺上座。乘如以律學見長，傳見《宋高僧傳》卷15；（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801c）生平請見介永強，〈唐高僧乘如生平事跡稽補〉，《唐史論叢》，2016年2期，頁292-29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鴻臚卿」，透露代宗認同轉誦此經等法事有助弭平亂事，此後成為密教忠實的護持者。⑦①

近年西洋學術界對於唐代「密教」的性質有過一番爭論，主要認為「整個唐代中華文化圈中，沒有明確記載獨立的『密宗』（esoteric school）此一宗派的文獻證據」。⑦② 而將相關論述集結出版的中譯本導讀，亦傾向「很難判定作為一個宗派或者一種傳統的『唐密』是否真的存在過。」⑦③ 唐代是否真的沒有「有自覺的唐代密教教派或傳承」？⑦④ 促使密教在中國生根、發揚光大的不空金剛，主要是以「瑜伽」（yoga）法門指稱其所傳教法，屬於大乘

⑦① 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32a-833a。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著，釋依法譯，《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頁129。「廣德二年……冬十月丙寅，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經天。丁酉，僕固懷恩死于靈州之鳴沙縣。時懷恩誘吐蕃數十萬寇邠州，……逼鳳翔府、盩厔縣，京師戒嚴。時以星變，羌虜入寇，內出仁王佛經兩輿付資聖、西明二佛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及奴虜寇逼京畿，方罷講。……丁巳，吐蕃大掠京畿男女數萬計，焚廬舍而去。……冬十月己未，復講仁王經於資聖寺。吐蕃至邠州，與迴紇相遇，復合從入寇。……庚辰，子儀先鋒將白元光合迴紇軍擊吐蕃之眾於靈臺縣之西原，斬首五萬級，俘獲人畜凡三百里不絕。辛巳，京師解嚴。」（重點為作者所加）（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頁276、279-280。）Imann Lai, “The Marble Sculpture *Maṇḍala of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Excavated from Anguo Monastery in Xi’an,” pp. 161-162.

⑦② “ ……there is no clear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a separate or distinct “ Esoteric School” in the Sinitic cultural sphere during the Tang.” Richard McBride II, “Is There Really “Esoteric”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27 (2004.2), p. 355. 中譯本見理查德・D. 麥克布萊德著，梁珏譯，〈果真有“密乘”佛教嗎？〉，收入沈衛榮主編，《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頁166。

⑦③ 沈衛榮，〈導論〉，收入沈衛榮主編，《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頁13。

⑦④ Robert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p. 275; 中譯本見羅伯特・沙夫著，張凌暉譯，〈論漢傳密教〉，收入沈衛榮主編，《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頁120。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佛教，以為是「成佛速疾之路」，尤其越近晚年愈持此看法。[75] 事實上距中唐不遠，活動於十世紀的北宋贊寧（919－1001），主要以「瑜伽教」指稱金剛智及其徒不空，以中期密教經典《金剛頂經》為基礎所傳之法。[76] 不空展開護國活動思想的契機，或為南海或河西時期，[77] 但是高舉「護國」大纛，應始於代宗朝《仁王經》翻譯事業，獲得皇帝及當權者支持，從此活躍展開世間、出世間法，奠下「瑜伽教」得以流傳的基礎。[78] 6尊白石造像，即與此段代宗朝初年，可謂翻轉密教傳法的歷史有關。

此組《仁王經》曼荼羅造像製作上限，應在《仁王經儀軌》成立之代宗大曆元年（766），下限應亦不至於相隔太遠，畢竟大曆二年至四年（767－769）間，吐蕃仍連年來犯，兩度進逼長安，軍事上的窘迫與祈攘退敵的需要，仍如永泰元年《仁王經》翻譯之初。[79]

---

[75] 《三藏和上臨終陳情辭表》:「……三十餘年演瑜伽法門。」（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46b）;《大唐大廣智三藏和上影讚》:「……瑜伽上乘秘密之門。」（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47a）; 其弟子惠果稱不空之教為「瑜伽祕密之宗，普賢深妙之要。」（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52b。）其教法多依《金剛頂經》，即密教四部分類法最後兩類，瑜伽與無上瑜伽密教之基礎經典。（塚本啟祥等，《梵語仏典の研究》，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89〕，頁37）關於「瑜伽」教之討論可見Charles D. Orzech, "The 'Great Teaching of Yoga' the Chinese Appropriation of the Tantras, and the Quest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vol. 34 (2006), pp. 45-52. 以為即使金剛智、不空以金剛乘指稱其所傳之《金剛頂經》教法，但是在其著述仍透露「瑜伽」（Yoga）並非「宗派」（sect, school）的態度，見前引文，頁68；Orzech對唐代密教研究用力已久，相關史料掌握嫻熟，惜沈衛榮主編，《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一書，未收此文。

[76] 賴富本宏，《中国密教の研究：般若と贊寧の密教理解を中心として》，頁121-123。

[77] 山口史恭，〈不空三蔵における護国活動の契機について〉，《豊山学報》，59號（2016.3），頁17-23。

[78] 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著，釋依法譯，《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頁130-145；呂建福，《中國密教史》，修訂版，頁340-345。

[79] 胡岩濤，〈代宗朝唐蕃關隴戰爭與京都防禦體系的構建〉，《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2016年4期，頁99。

臺大藝術學資料庫

目前可見6尊造像雕刻謹嚴，裝飾華麗，尤其金剛波羅蜜多蓮座仍有大片貼金，可窺見其奢華；曼荼羅建造之初，應是金碧輝煌美不勝收。此際官員需減薪付回紇賞金，在國家動盪、府庫不充裕的年代，可見唐廷對此組曼荼羅的重視。[80] 確實，不空新「譯」密教化之《仁王經》相關經疏，不僅是在第七品加入金剛界五菩薩及陀羅尼，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圖像、舉行法事，以法界力成就護衛仁王國土的世間法。[81] 換言之，建立曼荼羅，舉辦密教儀式，是實踐《仁王經》所說「七難即滅，國土安樂」的關鍵；大安國寺出土此組曼荼羅，不僅是《仁王經》相關翻譯事業，深受代宗皇帝信賴的證據，也透露大安國寺應有具格阿闍梨（Ācārya），舉辦相關宗教儀式。此組曼荼羅為獨佔宗教儀軌相關知識的密教僧，與皇權緊密結合奠下基礎，或因此迎來密教傳法的黃金時期。

除了皇帝的支持，代宗朝初期，外廷權臣如宰相元載（713－777）、王縉（700－781）及權勢日增的宦官魚朝恩（722－770）等，皆崇奉佛教；[82] 促成重新翻譯《仁王經》事業，學者以為是掌握神策軍、救駕皇帝有功的魚朝恩等反對僕固懷恩的軍事勢力所主導。[83] 魚朝恩素來與青龍寺僧人良貴（717－777）交好，在戰事最吃緊時，乃良貴帶領百法師於長安資聖寺持誦《仁王經》與《密嚴經》，而非不空；其後良貴更在大安國寺長期講《仁王經》，

---

[80] 「詔稅百官錢，市絹十萬以賞迴紇。」見劉昫撰，楊家駱主編，《舊唐書》，卷11，頁280。

[81] Charles D. Orzech,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pp. 147-159.

[82] 竹島淳夫，〈唐中期における密教興隆の社会的基盤〉，收入宮坂宥勝等編，《密教大系》，第2卷，中国密教（京都：法藏館，1994），頁57-58。劉淑芬，〈中古的宦官與佛教〉，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1999），頁45-70。李丹婕，〈緣何「禁而不止」? —玄肅代三朝的權力群體與佛教〉，收入侯旭東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上（臺北：新文豐，2010），頁245-286。

[83] 中田美絵，〈唐朝政治史上の「仁王経」翻訳と法会：内廷勢力専権の過程と仏教〉，《史學雜誌》，115卷（2006.3），頁322–347；譯罷由魚朝恩親率扮成天龍八部之北衙禁軍護送出宮，可見其個人參與程度（圓照撰，《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第55冊，目錄部全・2156，頁751c）。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移住此寺。[84]

應有粟特血統、出身涼州的不空與軍事權貴交好，素來頗受關注，早在玄宗朝，住武威開元寺時，為節度使哥舒翰等數千人灌頂：「節度以下，至于一命，皆授灌頂，士庶之類。數千人眾，咸登道場。」其中應不乏戍邊軍士；哥舒翰、封常清、田良丘等並留下護持其譯經事跡，三人俱為安史之亂鎮守潼關名將；[85] 不空並與掌握兵權宦官往來，更有武人結束軍旅生涯後，投身不空門下為僧。[86] 此外，曾任禁軍將領之右龍武將軍宦官李元琮（原為史姓，？－776），自天寶年間即執弟子禮，護持不空不遺餘力，大曆元年（766）成為掌管宗教事務的「勾當京城諸寺觀修功德使」（任期766－776年），代宗朝不空教團在其護持下，不斷壯大；[87] 其後，大曆十三年（778）接任內功德使的宦官李憲誠（生卒不詳）亦是不空弟子。高舉「護國」大纛的《仁王經》經疏及造像相關事業，實符合良貴、不空等僧侶其握有軍權支

[84] 良貴傳見《宋高僧傳》卷5（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735a-c）。魚朝恩失勢後良貴亦左遷，見山口史恭，〈良貴の生涯及び不空三蔵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智山學報》，53卷（2004.3），頁407。

[85] 趙遷撰，《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0冊，史傳部二・2056，293b；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第55冊，目錄部全・2157，頁881bc。Imann Lai, *The Famensi Reliquary Deposit: Ic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 p. 89.

[86] 中田美絵，〈不空の長安仏教界台頭とソグド人〉，《東洋學報》，89卷3號（2007.12），頁299-301。吉田豊，〈トルファン学研究所所蔵のソグド語仏典と「菩薩」を意味するソグド語語彙の形式の来源について：百済康義先生のソグド語 典研究を偲んで〉，《佛教學研究》，62/ 63卷（2007.3），頁54。

[87] 塚本俊孝，〈中国に於ける密教受容について—伝入期たる善無畏・金剛智・不空の時代〉，《佛教文化研究》，第2號（1952.9），頁94。樊婧，〈唐李元琮墓誌考釋〉，《唐史論叢》，2014年1期，頁250-257；其亦是魚朝恩麾下將領，曾為飛龍廄使（圓照撰，《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第52冊，史傳部四・2120，頁829c）；飛龍廄為宦官權力繼承中心。（趙雨樂，《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37）過去以為其是第一任功德使，但是玄宗朝高力士有「開府儀同三司兼左街功德使）職銜，應是目前已知唐代第一任功德使。（嚴耀中，〈唐代內侍省宦官奉佛因果補說〉，《唐研究》，10卷〔2004.12〕，頁66）。

臺大藝術史研究資料庫

持者的需求。[88]

結論：印度密教在東亞生根

上述大安國寺出土6尊白石造像，為中原地區鮮少出土的密教圖像，其中有應是東亞時代最早的金剛界五方佛，此例為有鳥獸座寶生如來造像；[89] 著甲冑的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則為此類東亞特殊女尊裝束管見最早例證；[90] 此組《仁王經》曼荼羅造像，亦為中國首次出土相關文物。

唐代密教自唐末已式微，目前相關歷史，多依靠日本入唐密教僧攜回東瀛的文獻、圖像及其論述等資料重建，但是其入唐都在九世紀以降。[91] 不空順應唐代社會情勢、風土民情，強調密教「護國」，在代宗朝成功獲得帝王及掌握軍政權力者的支持，將其傳播推上高峰；但是除了少數記載於《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等文獻，相關活動具體內容難以蠡測。此組八世紀下半葉代宗朝初年密教造像，不僅提供其傳法事業更多相關例證，亦有助重建日本密教僧入唐前近半世紀的唐代密教及其圖像的歷史。

---

[88] 塚本善隆，〈唐中期以来の長安の功德使〉，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3，《中国中世仏教史論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頁255-260。

[89] 敦煌出土密教文物，尤其是胎藏與金剛界兩部曼荼羅相關造像其源流多為藏傳密教，（田中公明，《敦煌：密教と美術》〔京都：法蔵館，2000〕，頁6-15、195-216）難以反映唐代所傳密教；除了各種變化觀音信仰，唐代中原地區四川、西安出土密教文物，多與金剛界法有關，如前述陝西香積寺出土白石小塔、法門寺出土文物（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及四川盤陀山大日如來三尊（朴亨國，〈大阪金剛寺金堂の金剛界大日・不動・降三世の三尊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四川省盤陀寺石窟の大日三尊龕の紹介を兼ねて〉，頁402-404。）而四川盤陀山大日如來三尊像、白石小塔四波羅蜜，及訂定為晚唐造像之日本東寺五大虛空藏菩薩像，（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東寺観智院蔵五大虚空蔵菩薩像》〔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03〕）皆有鳥獸座，所佔比例高。

[90] 牽涉議題駁雜，將另文討論。

[91] 賴富本宏，《日中を結んだ仏教僧》（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9），頁47、68-76。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安國寺因佔長樂坊半坊以上之地，唐人因此稱為「大」安國寺，為睿宗潛龍時舊宅；又因緊鄰大明宮，成為重要的官方寺院。[92] 代宗朝除了延續前朝傳統，將重要僧侶遷入，並在此舉辦頗具政治意義的審定戒律會議，更加深其與皇權的連結，但是此寺並未以密教道場而聞名。[93] 素來被認為與密宗關係深厚的青龍寺、西明寺或大興善寺等，時至今日未出土密教相關遺物。[94] 反觀玄宗由太極宮遷移至城東興慶宮，此地遂成新興政治重心；安史之亂後，肅宗以降帝王皆居住於大明宮，唐代政治中心又轉移至此，直到唐末。[95]《仁王經》譯場位於大明宮南桃園，設立相關造像的大安國寺，位於其南僅一街之隔的長樂坊；前述年代亦在八世紀下半葉的白石聖觀音像，發掘地點在興慶宮景龍池。這些實踐密教教理的八世紀下半葉文物，出乎後人意料，並非出土於上述不空或惠果等密教祖師駐錫寺院，而是長安城政治中心附近區域，反映此際密教與政權緊密配合的現象。

---

[92] 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148。此寺佔長樂坊三分之二坊地，屬於至少佔二分之一坊地的第二等級大寺，因此唐人多稱「大」安國寺，見宿白，〈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文物》，2009年1期，頁29-31；相關記錄見小野勝年，《中国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京都：法藏館，1989），解說篇，頁69-77。為睿宗在藩舊宅，玄宗朝皇帝注《金剛經》畢，依許於「安國寺開經。」（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錄》，第55冊，目錄部全・2157，頁878c）稟賦出眾者皇帝即詔入講經或移居此寺，如元康應是在八世紀初，因「辭理渙然」，「詔入安國寺講此三論。」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727c）

[93] 李丹婕，〈緣何「禁而不止」?—玄肅代三朝的權力群體與佛教〉，頁281-283。代宗朝有前述良貴在此定期講《仁王經》，後移住此寺；崇惠現神通，大曆三年（768）前後皇帝「詔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817a）大曆十三年（778）為調解四分律舊疏、新疏之爭，飭14位大德於此寺編《僉定四分律疏》十卷。（贊寧等撰，《宋高僧傳》，第50冊，史傳部二・2061，頁804bc）

[9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5期，頁322-327；馬得志，〈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1989年2期，頁231-262；楊鴻勛，〈唐長安青龍寺密宗殿堂（遺址4）復原研究〉，頁383-401；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1期，頁45-55。

[95] 楊鴻年，《隋唐宮廷建築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6-9。

臺大圖書館期刊論文資料庫

當今最著名的《仁王經》曼荼羅，應屬京都東寺的九世紀木雕立體曼荼羅，其源流至今眾說紛紜。[96] 擘劃者真言宗祖師空海（774－835），曾以學問僧身份入唐，從不空弟子惠果（746－805）習瑜伽密教；即使未緣參拜此大安國寺白石曼荼羅，應亦有所耳聞。[97] 事實上，空海亦繼承了不空教團教教法，陸續以「護國」為名建立道場，圓寂前，以祈求「國家安泰」為名，在宮中建立每年正月舉行的「後七日御修法」密法，從此「永為恆例」，直至今日仍定期舉辦，真言宗亦千年不絕。[98]

不空順應唐土在地需要，重新編纂《仁王經》，將密教演繹為成就出世間佛法，與世間護國大法的不二至道，建立起與唐王朝共榮的紐帶關係；其後，教理為日本僧人承繼，促使自印度傳來、不乏猙獰怪誕異國神祇的密教，在東亞生根茁壯，從此改變日本文化風貌。[99] 此6件原屬《仁王經》立體曼荼羅的白石造像，應是東亞獨特的「護國」密教思想的首次實踐跡證。

---

[96] 此曼荼羅東瀛古來即多理解為《仁王經》相關曼荼羅，但是是否牽涉其他經典教理，學者間仍意見分歧，然而擘畫者空海應有其自身之創發，詳見高田修，〈東寺講堂の諸尊とその密教的意義〉，頁34-35。

[97] 松崎惠水，〈長安における弘法大師空海〉，《密教文化》，149期（1985.1），頁21-34。中野玄三，《東寺の明王像》（京都：東寺寶物館，2005），頁8-9。

[98] 醍醐天皇即位，空海即提出以唐代內道場為範式，為國修《仁王經》等大法，其後天皇陸續下賜高野山及在平安京中心之東寺建立鎮護國家道場，前者號「鎮護國祚寺」，後者號「教王護國寺」。此應承襲自其師惠果之國王觀，詳別所弘因，〈弘法大師の護國精神〉，《智山學報》，13卷（1939.12），頁207-220。Robert F. Rhodes, “The Buddhist-State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ought of Saichō and Kūkai,” *The Otani Gakuho*, vol. 97, no. 2, pp. 15-16.「後七日御修法」除了明治維新時中斷，其後明治十六年（1883）以後轉移到東寺舉行，為京都年中盛事，即使2021年疫情肆虐仍繼續舉辦，參閱產經新聞：https://www.sankei.com/photo /story/ news/210108/sty 2101080006-n1.html（檢索日期：2021年6月22日）。

[99] Charles D. Orzech,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p. 206; 岩崎日出男，〈密教的傳播與滲透〉，收入沖本克己等編，釋果鏡譯，《興盛開展的佛教》，中國II隋唐（臺北：法鼓文化，2016），頁389-391。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記〕本文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唐中葉密教造像藝術」之部份研究成果。對於兩位匿名審稿人及顏娟英教授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一切文責自負。並謹以此文追思臺灣當代藝術策展人李樂（Dr. Felix Schoeber），本文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圖版，皆其提供。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唐）不空譯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8冊，般若部四・246。
《金剛頂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65。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陀羅尼念誦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4。
《仁王般若念誦法》，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5。
《仁王般若陀羅尼釋》，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9冊，密教部二・996。
《攝無礙大悲心大陀羅尼經計一法中出無量義南方滿願補陀落海會五部諸尊等弘誓力方位及威儀形色執持三摩耶幖幟曼荼羅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20冊，密教部三・1067。
（唐）阿地瞿多譯
《陀羅尼集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901。
（唐）良賁撰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33冊，經疏部一・1709。
（唐）金剛智譯
《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66。
（唐）宗叡撰
《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74。
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
《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冊，圖像部。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
《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唐）善無畏譯
《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48。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大毘盧遮那經廣大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8冊，密教部一・851。

（唐）圓照撰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2冊，史傳部四・2120。

《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56。

《貞元新定釋教目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5冊，目錄部全・2157。

（後秦）鳩摩羅什譯

《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8冊，般若部四・245。

（唐）趙遷撰

《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0冊，史傳部二・2056。

（北宋）贊寧撰

《大宋僧史略》，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4冊，事彙部下・2126。

（北宋）贊寧等撰

《宋高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50冊，史傳部二・2061。

近人論著

大村西崖

1993 《密教發達志》，臺北：武陵出版社。

Ōmura, Seigai

1993 *Mijiao fada zhi* (Monograp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soteric Buddhism), Taipei: Wuling chubanshe.

介永強

2016 〈唐高僧乘如生平事跡稽補〉，《唐史論叢》，2期，頁292-298。

Jie, Yongqiang

2016 “Tang gaoseng Chengru shengping shiji jibu (Compendium of 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Tang Eminent Monk Chengru),” *Tangshi luncong* (Review of the Tang History), no. 2, pp. 292-298.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

1974 〈唐青龍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5期，頁322-32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Zhongguo kexueyuan kaogu yanjiu suo Xi'an gongzuo dui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f Xi'an,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a Academy of Sciences)

1974 "Tang Qinglong si yizhi fajue jianbao (Briefing on Excavation of Qinglong Temple Ruins in Tang Dynasty)," *Archaeology*, no. 5, pp. 322-327.

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著；釋依法譯

1999 《唐代佛教：王法與佛法》，新北市：佛光出版社。

Weinstein, Stanley; Venerable Yifa trans.

1999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New Taipei City: Foguang chubanshe.

史岩主編

1988 《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4，隋唐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Shi, Yan ed.

1988 *Zhongguo meishu quanji: diaosubian* (Compedium of Chinese Art: Sculpture), vol. 4, Sui Tang Sculpture,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安家瑤

1990 〈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期，頁45-55。

An, Jiayao

1990 "Tang Changan Ximing si yizhi fajue jianbao (Briefing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Ximing Temple Site in Chang'an, Tang Dynasty)," *Archaeology*, no. 1, pp. 45-55.

李丹婕

2010 〈緣何「禁而不止」？—玄肅代三朝的權力群體與佛教〉，收入侯旭東編，《張廣達先生八十華誕祝壽論文集》，上，臺北：新文豐，頁245-286。

Li, Danjie

2010 "Yuanhe 'jin er bu zhi'?—xuan su dai sanzhao de quanli qunti yu Fojiao (Why is it 'Unprohibitable'? —Authorities and Buddhism in the Reigns of Emperors Xuanzong, Suzong and Daizong)," in Hou Xudong ed., *Zhang Guangda Xiansheng Bashi Huadan Zhushou Lunwen Ji*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Zhang Guangda), vol. 1, Taipei: Shinwenfeng Print Co., pp. 245-286.

吳立民、韓金科

1998 《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Wu, Limin, and Jinke Han

1998 *Famensi digong Tang mi mantuluo zhi yanjiu* (Study of Esoteric Buddhist Maṇḍalas of Tang Dynasty from the Underground Palace, Famensi, Shaanxi), Hong Kong: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Buddhist Culture of China.

呂建福

2011 《中國密教史》，修訂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ü, Jianfu
2011 *Zhongguo mijiao shi* (History of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hian Social Sciences Press.
何恩之、何平南編纂
1983 《中國古代石雕藝術》，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Howard, Angela Falco, and Pingnan He eds.
1983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the Wei Through the T'ang Dynasties*, Taipei: National Museum of History.
李域錚編
1995 《陝西古代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
Li, Yuzheng ed.
1995 *Shaanxi gudai shike yishu* (Art of Ancient Stone-Carving in Shaanxi),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沈衛榮主編
2013 《何謂密教：關於密教的定義、修習、符號和歷史的詮釋與爭論》，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Shen, Weirong ed.
2013 *What is Tantrism?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troversy of the Definition, Practice, Semi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antrism*,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李靜杰、田軍編著
2019《定州白石佛像》，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
Li, Jingje, and Jun Tian ed.
2019 *Dinzhou baishi foxiang* (Marble Buddhist Sculptures from Ding Prefecture, Hebei), Taipei: Chuefeng Buddhist Art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周一良著；錢文忠譯
1998 〈唐代密宗〉，收入氏著，《周一良集》，3，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頁1-152。
Chou, Yiliang; Qian, Wenzhong trans.
1998 "Tangdai mizong (Tantrism Under the Tang)," in *Zhou Yiliang 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ou Yi-liang), vol. 3,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pp. 1-152 .
金申
2004 《佛教美術叢考》，北京：科學出版社。
Jin, Shen
2004 *Fojiao meishu congkao* (Essays on Buddhist Art), Beijing: Science Press.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
2005 《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7 《法門寺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et al eds.
2005 *The Tomb of Li Xian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7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Famen Temple*, 2 vol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胡岩濤
2016 〈代宗朝唐蕃關隴戰爭與京都防禦體系的構建〉,《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報）》，4期，頁97-103。
Hu, Yantao
2016 "Daizong zhao tangfan guanlong zhanzheng yu jingdu fangyu tixi de goujian (Tang-Tibetan War at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pital's Defense System in Emperor Daizong's Reign)," *Journal of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 4, pp. 97-103.
馬得志
1989 〈唐長安青龍寺遺址〉,《考古學報》，2期，頁231-262。
Ma, Dezhi
1989 "The Qinglongsi in Tang Dynasty Chang'an," *Archaeology*, no. 2, pp. 231-262.
宿白
2009 〈試論唐代長安佛教寺院的等級問題〉,《文物》，1期，頁27-40。
Su, Bai
2009 "On the Hierarchy in Buddhist Temples of Tang Dynasty in Chang'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7-40.
常青
2019 〈唐長安城大安國寺遺址出土密教造像再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10期，頁4-19。
2020 《長安與洛陽：五至九世紀兩京佛教藝術研究》，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
Chang, Qing
2019 "A More Research into the Esoteric Buddhism Sculptures Unearthed from The Grand An'guo Temple Rui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618-907 CE),"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210, pp. 4-19.
2020 *Chang'an and Luoyang: Buddhist Art of the Two Chinese Capitals from the Fifth to the Ninth Century*, 2 vol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張鴻修
1998 《隋唐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
Zhang, Hongxiu
1998 *Stone Carving Arts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揚之水
2012 《曾有西風半點香：敦煌藝術名物叢考》，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Yang, Zhishui
2012 *Ceng you xifeng bandian xiang: Dunhuang yishu mingwu congkao* (Residual Fragrance from the West Wind: A Study of the Nomenology in Dunhu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彭金章主編
2003 《密教畫卷》,《敦煌石窟全集》,卷10,香港:商務印書館。
Peng, Jinzhang ed.
2003 *Mijiao huajuan* (Esoteric Buddhist Art), vol. 10 of *Dunhuang Shiku quanji* (Compendium of Dunhuang Cave-Temple Series), Hong Kong: Shangwu yinshuguan.
程學華
1961 〈唐貼金畫彩石刻造像〉,《文物》,第7期,頁61-63。
Cheng, Xuehua
1961 "Tang tiejin huacai shike zaoxiang (Polychrome Marble Sculptures of the Tang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61-63.
楊鴻年
1992 《隋唐宮廷建築考》,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9 《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ang, Hongnian
1992 *Sui Tang gongting jianzhu kao* (On Palace Architectur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Xi'an: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Sui Tang liangjing fangli pu* (Guidebook of Wards in the Two Capital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楊鴻勛
1984 〈唐長安青龍寺密宗殿堂(遺址4)復原研究〉,《考古學報》,3期,頁383-401。
Yang, Hongxun
1984 "Stud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all of the Buddhist Esoteric "True Word" Sect of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Qinglong Temple in Chang'an,"*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83-401.
趙力光主編
2010 《長安佛韻: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Zhao, Liguang ed.
2010 *Buddhist Sculpture in the Xi'an Beilin Museum*,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趙雨樂
1994 《唐宋變革期之軍政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Zhao, Yule
1994 *Tang Song biangeqi zhi junzheng zhidu*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Tang-Song Transition),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齊慶媛
2015 〈宋遼金時期菩薩像造型分析〉，北京：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Qi, Qingyuan
2015 *Song Liao Jin shiqi pusaxiang zaoxing fenxi*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Bodhisattva in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Beijing: Ph. D. Diss., Tsinghua University.
劉向陽
2012 《唐代帝王陵墓》(修訂本)，西安：三秦出版社。
Liu, Xiangyang
2012 *Tangdai diwang lingmu* (Tombs of Emperors in Tang Dynasty), revised edition,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樊婧
2014 〈唐李元琮墓誌考釋〉,《唐史論叢》，1期，頁250-257。
Fan, Jing
2014 "Tang Li Yuancong muzhi kaoshi (On Li Yuancong's Epitaph of Tang Dynasty), *Tangshi luncong* (Review of the Tang History), no. 1, pp. 250-257.
劉淑芬
1999 〈中古的宦官與佛教〉，收入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縣：稻鄉出版社，頁45-70。
Liu, Shufen
1999 "Zhonggu de huanguan yu Fojiao (Eunuchs and Buddhism in Medieval China)," in Zheng Qinren jiaoshou rongtui jinian lunwenji bianji weiyuanhui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Cheng Ching-Jen) ed., *Zheng Qinren jiaoshou rongtui jinian lunwenji*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Cheng Ching-Jen), Taipei: Daoxiang chubanshe, pp. 45-70.
賴依縵
2009 〈香積寺唐代奉獻小塔—中國出土的金剛界「五部心觀」系圖像〉,《故宮文物月刊》，314期，頁78-91。
Lai, Imann
2009 "Xiangjisi Tang dai fengxian xiaota ─ Zhongguo chutu de jingang jie wubu xinguan xi tuxiang (The Votive Stupika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the Xiangji Temple ─ Image Associated with *Gobu shinkan, Contemplating in One's Mind of the Vajradhātu Mandala's Five Families,* Found in China),"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14, pp. 78-91.
顏娟英
1997 〈天龍山石窟的再省思〉，收入臧振華主編，《中國考古學與歷史學之整合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編輯委員會，頁839-92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Yen, Chuanying
1997 “Tianlongshan shiku de zai xingsi (Rethinking the Tianlongshan Grottoes),” in Tsang Chenghwa 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Taipei: Publications Editorial Board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p. 839-928.

嚴耀中
2004 〈唐代內侍省宦官奉佛因果補說〉,《唐研究》, 10卷，頁65-72。

Yan, Yaozhong
2004 “Tangdai neishisheng huanguan fengfo yinguo bushuo (Supplementary Thought on Why Eunuchs Devoted to Buddhism in Tang Dynasty),” *Tang yanjiu* (Studies of the Tang Dynasty), vol. 10, pp. 65-72.

山口史恭
2004 〈良貴の生涯及び不空三蔵との関係について〉,《智山學報》, 53卷，頁393-421。
2007 〈仁王陀羅尼念誦儀軌について〉, 收入大正大學真言學豐山研究室加藤精一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 ,《真言密教と日本文化》, 下，東京：ノンブル，頁107-129。
2016 〈不空三蔵における護国活動の契機について〉,《豊山学報》, 59號，頁15-37。

Yamaguchi, Shikyo
2004 “A Study on Liang-pen (良貴)’s Life and Amoghavajra,” *The Chizan gakuhō* (Journal of Chisan Studies), vol. 53, pp. 393-421.
2007 “A Study of the “Ninnō-darani-nenjyu-giki”,” in Taisho University Shingon Studies Buzan Research Office Dr. Katō Seiichi’s Collected Works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Publishing Meeting ed., *Shingon Esoteric Buddhism and Japanese Culture*, vol. 2, Tokyo: Nonburu, pp. 107-129.
2016 “Amoghavajra’s Motive for His Activities of National Defense,” *Buzan gakuhō* (Journal of Buzan Studies), no. 59, pp. 15-37.

下松徹
1987 〈東寺講堂の諸尊と三輪身說〉,《密教文化》, 157期，頁50-66。

Shimomatsu, Toru
1987 “Twenty-one Buddhas in the Lecture Hall of the Toji-Temple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Threefold Circle-Body,” *Mikkyō bunka* (Journal of Esoteric Buddhism), no. 157, pp. 50-66.

小野勝年
1989 《中国隋唐長安・寺院史料集成》, 京都：法藏館。

Ono, Katsutoshi
1989 *Compilation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Temples in Chang’an*, Kyoto: Hozoka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井上曙生
1987 〈经典と図像と仏像：襤褸衣を中心にして〉,《密教図像》, 5號，頁55-70。
Inoue, Akemi
1987 "Kyōten to zuzō to butsuzō: kaitōe o chūshin ni shite (Text, Iconography and Buddhist Images: A Focus on the Vest Robe)," *Mikkyō zuzō* (The Journal of Buddhist Iconography), no. 5, pp. 55-70.
中田美絵
2006 〈唐朝政治史上の「仁王経」翻訳と法会：内廷勢力専権の過程と仏教〉,《史學雜誌》, 115卷，頁322-347。
2007 〈不空の長安仏教界台頭とソグド人〉,《東洋學報》, 89卷3號，頁293-325。
Nakata, Mie
2006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Renwang Sutra and Related Buddhist Ceremonies: The Role of Buddhism in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Tang Inner Court," *Shigaku zasshi*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vol. 115, pp. 322-347.
2007 "Bukong's Rise within Chang'an's Buddhist Circles and Sogdians," *Toyo gakuhō*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vol. 89, no. 3, pp. 293-325.
中野玄三
2005 《東寺の明王像》, 京都：東寺寶物館。
Nakano, Genzo
2005 *Tō-ji no myōō-zō* (Statue of Wrathful King at Tō-ji Temple), Kyoto: Tō-ji Hōmotsukan.
水野敬三郎
1983 〈西安大安国寺遺址出土の宝生如来像について〉,《佛教藝術》, 150號，頁152-155。
Mizuno, Keizaburō
1983 "Seian Daiankokuji i-shi shutsudo no Hōshō nyorai-zō ni tsuite (On the Sculpture of Ratnasambhava Buddha Excavated from the Great Anguo Monastery, Xi'an)," *Ars Buddhica*, no. 150, pp. 152-155.
田中公明
2000 《敦煌：密教と美術》, 京都：法藏館。
2016 〈胎藏曼荼羅〉, 收入高橋尚夫等編,《空海とインド中期密教》, 東京：春秋社，頁211-234。
Tanaka, Kimiaki
2000 *Tonkō mikkyō to bijutsu* (Esoteric Buddhism and Art in Dunhuang), Kyoto: Hozokan.
2016 "Garbha-maṇḍala," in Hisao Takahashi et al eds., *Kūkai to Indo chūki mikkyō* (Kukai and the Mid-phase of 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Tokyo: Shunjusha, pp. 211-234.
石田尚豊
1975 《曼荼羅の研究》, 研究篇，東京：東京美術。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Ishida, Hisatoyo
1975 *Mandara no kenkyū* (Research on Maṇḍala), Kenkyū hen (Volume of the Studies), Tokyo: Tokyo bijutsu.

向井隆健
1982 〈不空訳「摂無礙経」をめぐる問題〉,《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60期，頁801-804。

Mukai, Ryuken
1982 "Fukū yaku 'Shōmugekyō' o meguru mondai (Issues Surrounding Amoghavajra's Translation of Manual of Potala Assembly),"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no. 60, pp. 801-804.

吉田豊
2007 〈トルファン学研究所所蔵のソグド語仏典と「菩薩」を意味するソグド語語彙の形式の源について：百済康義先生のソグド語仏典研究を偲んで〉,《佛教學研究》, 62/63卷，頁46-87。

Yoshida, Yutaka
2007 "Report of the Unpublished Buddhist Sogdian Texts of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and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a Sogdian Word for 'Bodhisattva'," *Bukkyōgaku kenkyū* (The Studies in Buddhism), vol. 62/63, pp. 46-87.

朴亨國
2001 〈大阪金剛寺金堂の金剛界大日・不動・降三世の三尊形式に関する一考察—中国四川省盤陀寺石窟の大日三尊龕の紹介を兼ねて〉, 收入氏著,《ヴァイローチャナ仏の図像学的研究》, 京都：法藏館，頁397-435。

Park, Hyoung-gook
2001 "Ōsaka Kongōji kondō no kongō-kai Dainichi, Fudō, Gōzanze no sanzon keishiki ni kansuru ichikōsatsu (Iconographic Study on the Vajradhātu Vairocana, Acala and Trailokyavijaya Triad of Kondō Hall at the Kongōji Temple, Ōsaka)," in Hyoung-gook Park, *Vairōchana butsu no zuzō gaku teki kenkyū* (Study of Vairocana Buddha's Iconography), Kyoto: Hozokan, pp. 397-435.

竹島淳夫
1994 〈唐中期における密教興隆の社会的基盤〉, 收入宮坂宥勝等編,《密教大系》, 第2卷，中国密教，京都：法藏館，頁26-64。

Takeshima, Atsuo
1994 "Tō chūki ni okeru mikkyō kōryū no shakai teki kiban (Social Basis of the Rise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the Mid-Tang Period)," in Yusho Miyasaka et al. eds., *Mikkyō Taikei* (Research Series of the Esoteric Buddhism), vol. 2, Chūgoku mikkyō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Kyoto: Hozokan, pp. 26-64.

別所弘因
1939 〈弘法大師の護國精神〉,《智山學報》, 13卷，頁201-22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essho, Hiroyoshi
1939 “Kōbōdaishi no gokoku seishin (The Great Tantric Master Kūkai’s Intention of Protecting the State),” *The Chizan gakuhō* (Journal of Chisan Studies), vol. 13, pp. 201-220.
松長有慶
1966 〈護國思想の起源〉,《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29期，頁69-78。
Matsunaga, Yukei
1966 “Gokoku shisō no kigen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Protecting the State),”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no. 29, pp. 69-78.
東京文化財研究所美術部編
2003 《東寺観智院蔵五大虚空蔵菩薩像》, 東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
Tōkyō bunkazai kenkyūsho bijutsu-bu (Department of Art, Tokyo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ed.
2003 *Tō-ji kanchiin zō godai kokuzō bosatsu zō* (The Five Great Ākāśagarbha Bodhisattva in Kanchiin, Tō-ji Temple), Tokyo: Tokyo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Properties.
東京國立博物館、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編集
1998 《唐の女帝・則天武后とその時代展：宮廷の栄華》, 東京：NHK。
Tokyo National Museum, NHK, and NHK Promotions eds.
1998 *The Glory of the Court: Tang Dynasty Empress Wu and Her Times*, Tokyo: NHK.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
2019 《国宝東寺—空海と仏像曼荼羅》, 東京：読売新聞社、NHK、NHKプロモーション。
2021 《最澄と天台宗のすべて：伝教大師一二〇〇年大遠忌記念特別展》, 東京：読売新聞社。
Tokyo National Museum et al eds.
2019 *National Treasures of Tō-ji Temple: Kūkai and the Sculpture Mandala*, Tokyo: Yomiuri shimbunsha, NHK, NHK Promotions.
2021 *Buddhist Art of the Tendai School: Commemorating the 1200th Anniversary of Saichō’s Death*, Tokyo: Yomiuri shimbunsha.
東京國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
2004 《中国国宝展》, 東京：朝日新聞社。
Tokyo National Museum, and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eds.
2004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Tokyo: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松原三郎
1969 〈盛唐彫刻以降の展開〉,《美術研究》, 257期，頁11-30。
1995 《中国仏教彫刻史論》, 東京：吉川弘文館。
Matsubara, Saburō
1969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High T’ang Afterward,” *Bijutsu Kenkyū: The Journal of Art Studies*, no. 257, pp. 11-30.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5 *Chūgoku bukkyō chōkoku shiron*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岩崎日出男

1986 〈不空三蔵と粛宗皇帝〉,《密教学研究》, 18號，頁113-129。

2016 〈密教的傳播與滲透〉, 收入沖本克己等編，釋果鏡譯 ,《興盛開展的佛教》, 中國II 隋唐，臺北：法鼓文化，頁365-428。

Iwasaki, Hideo

1986 "Fukū sanzō to Shukusō kōtei (Amoghavajra and Emperor Suzong)," *Mikkyōgaku kenkyū* (Study on the Esoteric Buddhism), no. 18, pp. 113-129.

2016 "Mijiao de chuanbo yu shentou (The Propagation and Diffus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Katsumi Okimoto et al eds; Venerable Guo-Jing trans., *The Efflorescenc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China II,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aipei: Dharma Drum Publication, pp. 365-428.

松崎惠水

1985 〈長安における弘法大師空海〉,《密教文化》, 149期，頁21-34。

Matsuzaki, Keisui

1985 "The Great Kobo Daishi Kukai in Chang-an," *Mikkyō bunka* (Journal of Esoteric Buddhism), no. 149, pp. 21-34.

岡崎譲治

1966 〈仏像鈴所顕の五大明王像—円珍請来図像との関連〉,《美術史》, 61期，頁18-32。

Okazaki, Joji

1966 "Butsuzō suzu shoken no godai myōōzō — Enchin shōrai zuzō to no kanren (The Five Great Wrathful Kings Casting on the Ritual Bell—Connection with the Buddhist Images Brought by Enchin)," *Bijutsushi: Journal of the Japan Art History Society*, no. 61, pp. 18-32.

高田修

1968 〈東寺講堂の諸尊とその密教的意義〉,《美術研究》, 253號，頁1-38。

Takata, Osamu

1968 "A Set of Twenty-one Vajrayanistic Statues Installed in the Lecture Hall of the Toji (Kyoogokokuji), Kyoto: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on the Unique Karma-Mandala Composed by These Images," *Bijutsu kenkyū: The Journal of Art Studies*, no. 253, pp. 1-38.

野口圭也

2016 〈インド中期密教とは何か〉, 收入高橋尚夫等編集 ,《空海とインド中期密教》, 東京：春秋社，頁12-23。

Noguchi, Keiya

2016 "Indo chūki mikkyō to wa nanika (What is the Mid-phase of Indian Esoteric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Buddhism?)," in Hisao Takahashi et al eds., *Kūkai to Indo chūki mikkyō* (Kukai and the Mid-phase of 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Tokyo: Shunjusha, pp. 12-23.

密教辭典編纂會編纂

1983 《密教大辞典》，京都：法藏館。

Mikkyō jiten Hensankai ed.

1983 *Mikkyō daijiten* (Dictionary of Esoteric Buddhism), Kyoto: Hozokan.

塚本善隆

1975 〈唐中期以来の長安の功徳使〉，收入《塚本善隆著作集》，3，《中国中世仏教史論攷》，東京：大東出版社，頁255-260。

Tsukamoto, Zenryu

1975 "Tō chūki irai no Chōan no kudokushi (The Merit Envoys of Chang'an Since the Mid-Tang Dynasty)," in *Tsukamoto Zenryuu chosaku shū* (Collected Works of Tsukamoto Zenryu), vol. 3, *Chūgoku Chūsei Bukkyō Shironkō* (A Discussion of Research on Chinese History of Buddhism During the Middle Age), Tokyo: Daito Publishing Co., Inc., pp. 255-260.

塚本俊孝

1952 〈中国に於ける密教受容について—伝入期たる善無畏・金剛智・不空の時代〉，《佛教文化研究》，第2號，頁89-99。

Tsukamoto, Shunko

1952 "Chinese Attitud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Bukkyō bunka kenkyū: The Journal of Buddhistic Culture*, no. 2, pp. 89-99.

塚本啟祥等

1989 《梵語仏典の研究》，密教經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

Tsukamoto, Keishyo et al.

1989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of 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Buddhist Tantra, Kyoto: Heirakuji shoten.

賴富本宏

1979 《中国密教の研究：般若と賛寧の密教理解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東出版社。

1998 〈明王の成立〉，收入松長有慶編著，《インド密教の形成と展開—松長有慶古稀記念論集》，京都：法藏館，頁329-355。

2005 〈中国密教の流れ〉，收在入賴富本宏、立川武藏編，《中国密教》，東京：春秋社，頁15-39。

2009 《日中を結んだ仏教僧》，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Yoritomi, Motohiro

1979 *Chūgoku mikkyō no kenkyū: Hannya to Sannei no mikkyō rikai o chūshin toshite* (Research on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A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Esoteric Buddhism with Prajna and the Monk Zanning), Tokyo: Daito Publishing Co., Inc.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8 "Myōō no seiritsu (Establishment of the Wrathful King)," in Yukei Matsunaga ed., *Indo mikkyō no keisei to tenkai: Matsunaga Yūkei koki kinen ronshū*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dian Esoteric Buddhism: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Matsunaga Yukei), Kyoto: Hozokan, pp. 329-355.

2005 "Chūgoku mikkyō no nagare (The Flow of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in Motohiro Yoritomi and Musashi Tachikawa eds., *Chūgoku mikkyō*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Tokyo: Shunjusha, pp. 15-39.

2009 *Nitchū o musunda bukkyō sō* (Buddhist Monk Who Connected Japan and China), Tokyo: Nōsan gyoson bunka kyōkai.

賴富本宏、下泉全曉

1994 《密教仏像図典》，京都：人文書院。

Yoritomi, Motohiro, and Zengyo Shimoizumi

1994 *Mikkyō butsuzō jiten* (Encyclopedia of Esoteric Buddhist Images), Kyoto: Jimbun Shoin.

藤善真澄

2005 〈密教と護國思想〉，收入賴富本宏、立川武藏編，《中国密教》，東京：春秋社，頁141-152。

Fujiyoshi, Masumi

2005 "Mikkyō to gokoku shisō (Esoteric Buddhism and the Idea of Protecting the State)," in Motohiro Yoritomi and Musashi Tachikawa eds., *Chūgoku mikkyō* (Chinese Esoteric Buddhism), Tokyo: Shunjusha, pp. 141-152.

Barrett, Timothy Hugh

1996 *Taoism Under the T'ang*, London: The Wellsweep Press.

Brinker, Helmut and Roger Goepper

1980 *Kunstschätze aus China*, *5000 v. Chr. bis 900 n. Chr., Neuere 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Zürich: Kunsthaus.

Chou, Yi-liang

1945 "Tantrism in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8, pp. 241-332.

Giebel, Rolf W.

2005 *The Vairocanābhisambodhi Sutra*, Berkeley: Numata Center.

Hodge, Stephen

2003 *The Mahā-Vairocana-Abhisambodhi-Tantra with Buddhaguhyas Commentary*, London: Routledge.

Howard, Angela Falco et al.

2006 *Chinese Sculp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iano, Annette L. et al.

2007 *Buddhist Sculpture from China, Selections from the Xi'an Beilin Museum*, *Fifth Through Ninth Centuries*,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Lai, Imann

2006 *The Famensi Reliquary Deposit: Ic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 London: Dis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8 "Esoteric Buddhist Remains Excavated from Tang China," in Sabrina Rastelli ed., *China at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s*, Milano: Skira Editore, pp. 75-79.

2022 "The Marble Sculpture *Maṇḍala of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Excavated from Anguo Monastery in Xi'an: The Initiation of Vernacular Esoteric Buddhism in East Asia," in Dorothy C. Wong ed., *Dynamics of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East Asian Buddhist Art, 5th-13th Century,* Wilmington: Vernon Press, pp. 139-171.

McBride II., Richard

2004 "Is There Really "Esoteric"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 27, pp. 329-356.

Orzech, Charles D.

1998 *Politics and Transcendent Wisdom: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The 'Great Teaching of Yoga' the Chinese Appropriation of the Tantras, and the Quest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vol. 34, pp. 29-78.

Pacht, Otto; David Britt trans.

1999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 London: Harvey Miller Publishers.

Paludan, Ann

1991 *The Chinese Spirit Roa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astelli, Sabrina ed.

2008 *China at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s*, Milano: Skira Editore.

Rhodes, Robert F.

2018 "The Buddhist-state Relationship in Japa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hought of Saichō and Kūkai," *The Otani Gakuho*, vol. 97, no. 2, pp. 1-24.

Rogers, Howard ed.

1998 *China: 5,000 Year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Arts*, New York: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

Sharf, Robert

2002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Sirén, Osvald

1925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London: Ernest Ben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Wood, Christopher S.
2000 “Introduction,” in Christopher S. Wood, *The Vienna School Reader: Politics and Art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1930s*, New York: Zone Book, pp. 9-72.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產經新聞
https://www.sankei.com/photo /story/ news/210108/sty 2101080006-n1.html（檢索日期：2021年6月22日）。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1690/maitreya-buddha-mi-le-%E5%BD%8C%E5%8B%92%E4%BD%9B（檢索日期：2020年7月15日）。
Chinese-Sanskrit Glossary 漢梵語彙
http://www.tibetanbuddhist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title=Praj%C3%B1%C4%81（檢索日期：2023年11月16日）。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28088/bodhisattva-on-a-lotus-throne?ctx=c421d3d7-fb87-4b8d-84e1-639d049e7538&idx=0（檢索日期：2022年3月15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寶生如來像。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所有。

圖2　頭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42。

圖3-1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所有。

圖3-2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背面。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4。

圖4-1　供養天女殘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56。

圖4-2~3　供養天女殘像。作者自攝。

圖5-1　降三世明王像。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所有。

圖5-2　〈大悲胎藏大曼荼羅〉，持明院，降三世明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東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1934)，第1冊，圖像部，頁702。

圖6-1　不動明王像。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所有。

圖6-2~3　不動明王像。作者自攝。

圖7　降三世明王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5。

圖8　馬頭明王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48。

圖9　遊戲坐明王像。Fondazione Palazzo Strozzi版權所有。

圖10　不動明王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52。

圖11　不動明王像。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53。

圖12　菩薩坐像。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版權所有。

圖13　供養天女像。何恩之、何平南編纂，《中國古代石雕藝術》(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3)，頁193。

圖14-1　法門寺金剛界45尊盝頂寶函，金剛嬉。吳立民、韓金科，《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之研究》(香港：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1998)，頁186。

圖14-2　〈金剛界九會大曼荼羅〉〈微細會〉金剛嬉。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圖像部，頁928。

圖15-1　釋迦佛像。史岩主編，《中國美術全集 雕塑編》，4，隋唐雕塑(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46。

圖15-2　寶生如來像，背面。趙力光主編，《長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藝術》，頁151。

圖15-3　釋迦佛像裳懸座。作者自攝。

圖16　月光菩薩像。彭金章主編，《密教畫卷》，《敦煌石窟全集》，卷10(香港：商務出版社，2003)，頁50。

圖17　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立柱拓本。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唐李憲墓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184、186。

圖18　唐玄宗，石台孝經，局部。作者自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9　唐肅宗，建陵，翼馬像。Ann Paludan, *The Chinese Spirit Road: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Stone Tomb Statuar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fig. 132.

圖20　顏真卿，爭座位碑拓本，局部。張鴻修，《隋唐石刻藝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111。

圖21　〈大悲胎藏大曼荼羅〉，持明院，般若佛母。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圖像部，頁701。

圖22　安國寺《仁王經》立體曼荼羅復原圖。作者等繪製。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寶生如來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2　頭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3-1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3-2　金剛波羅蜜多菩薩像　背面

臺大藝術期刊



圖4-1 供養天女殘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4-2 供養天女殘像 俯瞰



圖4-3 供養天女殘像 背面



圖5-1 降三世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5-2 〈大悲胎藏大曼荼羅〉
仁和寺版 持明院 降三世明王

臺大藝術期刊



圖6-1　不動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6-2　不動明王像殘存鬚狀髮梢



圖6-3　不動明王像所持繩索



圖7　降三世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



圖8 馬頭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9 遊戲坐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10 不動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圖11 不動明王像 唐 1959年
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碑林博物館藏

臺大學術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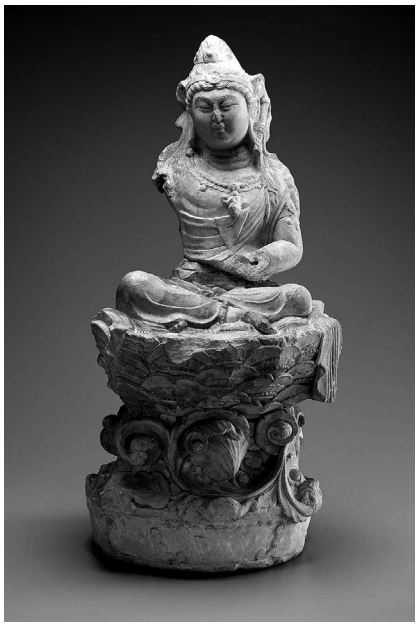


圖12　菩薩坐像　唐
傳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波士頓博物館藏



圖13　供養天女像　唐
傳中國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個人藏



圖14-1　法門寺金剛界45尊盝頂寶函之金剛嬉
唐　咸通十二年　1987年　中國陝西
省扶風市出土　法門寺博物館藏



圖14-2　〈金剛界九會大曼荼羅〉
仁和寺版　〈微細會〉　金剛嬉

臺灣博碩期刊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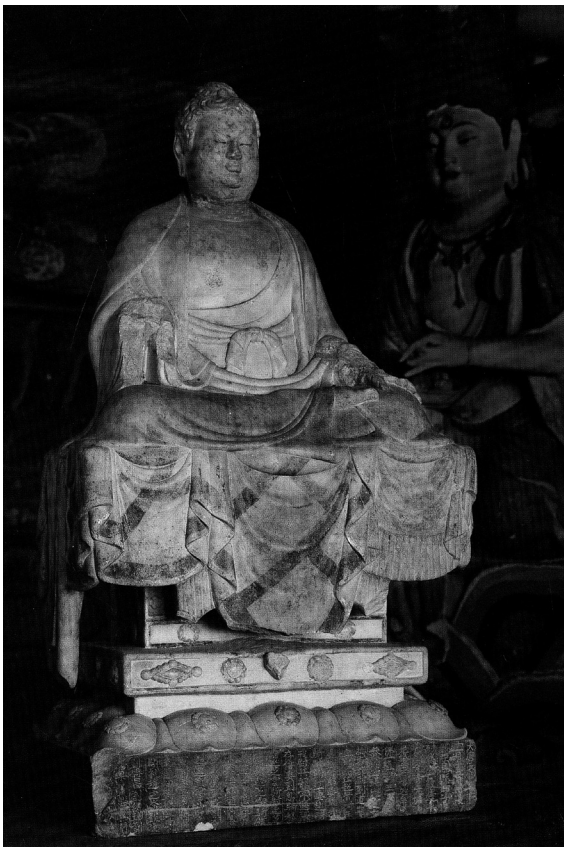


圖15-1 釋迦佛像 唐 天寶十一年 1949年
中國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無垢淨光塔出土
山西省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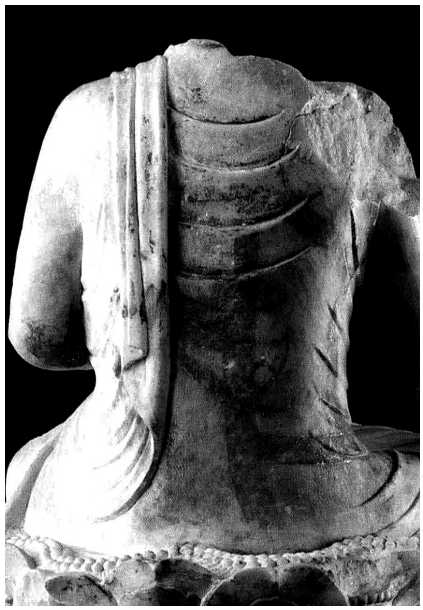


圖15-2 寶生如來像 背面



圖15-3 釋迦佛像裳懸座

臺大學術期刊



圖16　月光菩薩像　唐　大曆十一年　敦煌
莫高窟148窟　北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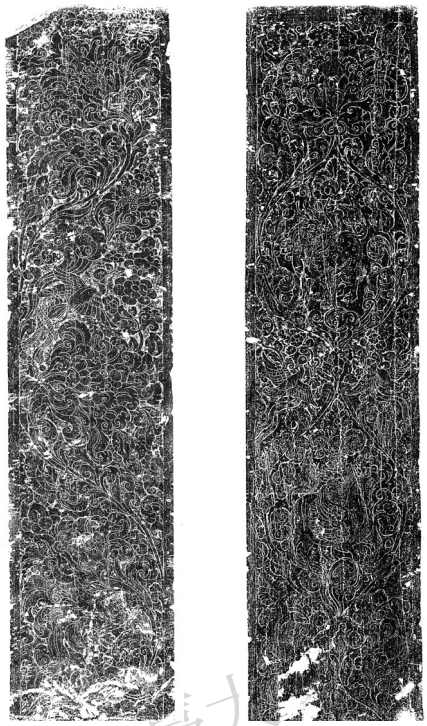


圖17　讓皇帝李憲墓石槨立柱拓本　唐　開元二十九年　2003年　陝西省蒲城縣出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臺大期刊資料庫



圖18 唐玄宗 石台孝經 局部 唐
天寶四年 碑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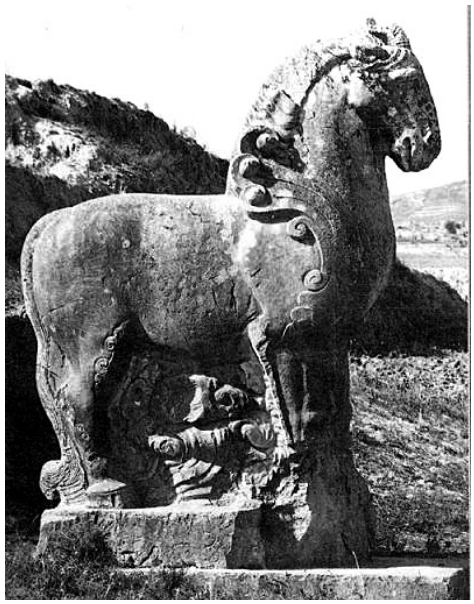


圖19 唐肅宗 建陵 唐 寶應元年
翼馬像 中國陝西省醴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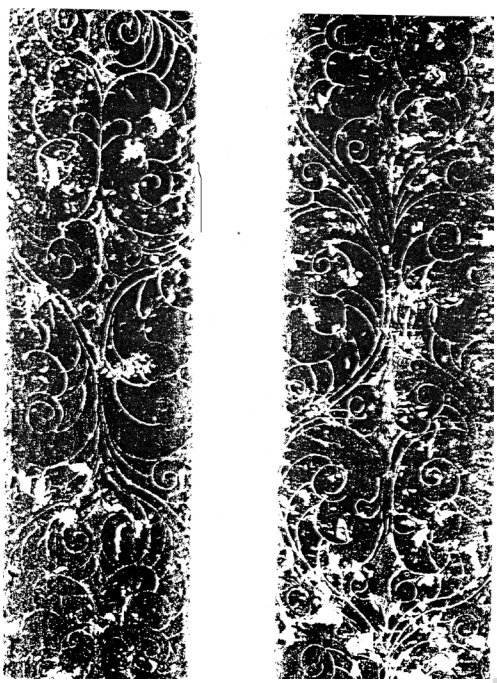


圖20 顏真卿 爭座位碑拓本 局部
唐 廣德二年 碑林博物館藏



圖21 〈大悲胎藏大曼荼羅〉 仁和寺版
持明院 般若佛母

臺灣美術期刊

圖22　安國寺《仁王經》立體曼荼羅復原圖　作者等繪製

臺大 科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Marble Sculptures Excavated from the Great Anguo Monastery in the Tang Dynasty Capital of Chang'an and the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Lai, I-man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A group of elaborate stone sculptures with traces of pigment and gilt gold were found in a pit 500 meters northeast of the city walls of Xi'an, Shaanxi in 1959, the discovery represent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excavations of sculptures in China after 1949 and the group as a whole offers a glimpse at activitie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Tang China. This location was identified as the Tang dynasty site of the Da Anguosi 大安國寺 (Great Monastery of Protecting the State) in capital Chang'an 長安 .

This paper focuses on six of the delicate marble sculptures, through the formal analysis indicated this group dated around 760s, arguably were once part of a maṇḍala expounded in the Chinese apocryphon, *Renwang huguo banruo boluomiduo jing*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 (*Prajñāpāramitā scripture for humane kings who wish to protect the state* ; often named as *Renwang jing* 仁王經 ; J. *Ninnōkyō*) and the exegeses retranslated by Amoghavajra and his circle that promised greater success in pacifying foreign assaults by responding to the need of the emperor and court elites.

This set of maṇḍala statues testifies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Esoteric Buddhism, under Amoghavajra's vigorous promotion, the transmission of Esoteric Buddhism reached its apogee as one of the dominant religious forces in the cour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izong 代宗 (r. 762-779).

The most celebrated remains of *Renwangjing* maṇḍala is the early ninth- century *Ninnogyō* maṇḍala at the Lecture Hall of Tō-ji 東寺 , Kyoto, which was supervised by the founder of the Japanese *Shingon* 真言 Esoteric Buddhist sect, Kūkai 空海 (774-835), who studied under one of Amogavajra's disciples in Chang'an during early ninth century. The legacy of Chinese apocryphon *Renwangjing*, i.e., the state-protecting doctrine ensured that Esoteric Buddhism continued until the late Tang dynasty in China and was also proselytized in Japan. This group of sculptures was arguably one of the earliest such pieces of evidence.

(Translated by Don Brix)

Keywords: Eighth century, Buddhist art, Esoteric Buddhism, Amoghavajra, State-protection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